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09 年 12 月 (总第十六期)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 2009. 12 —

E-mail: ias-fudan@fudan.edu.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一.王国斌、王铭铭、王柯加盟高研院	3
二.学术成果	4
1. 邓正来教授特约主编英文版《中国政治学刊》专号出版	4
2. 邓正来：“闭关”只为哈耶克	5
3. 孙国东：哈氏思想在中国的流播史	5
4. 邓正来：《哈耶克读本》出版	6
三.学术讲座	6
1. Steven W. Lewis教授主讲“公共空间与公民身份的媒介：上海与华盛顿比较研究”	6
2. 王国斌教授主讲“中国历史对社会理论的挑战与贡献”	8
3. 文贯中教授主讲“在大饥荒 50 周年之际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这场人祸的成因和教训”	11
4. Govindan Parayil教授主讲“可持续未来之科技”	13
5. 汪晖教授主讲“东西方学术思潮”	16
6. 王铭铭教授主讲“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	19
7. 纳日碧力戈教授主讲“民族生态新观察”	21
8. 艾尔曼教授主讲“反思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角色：1500-1800”	23
四.学术工作坊	25
1. 2010 年度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启事	25
2. 2010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申报启事	26
五.学术出访	28
1.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邓正来教授和郭苏建教授出访贵州大学	28
六.年会报道	33
1.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	33
2.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	36
3.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组织结构形成	48
4. 媒体相关报道	68
七.慧园鉴赏会	72
1. 复旦高研院举办第二期慧园鉴赏会	72
八.院内信息	74
1. 复旦高研院成员接受消防培训	74

一. 王国斌、王铭铭、王柯加盟高研院



2009年6月和12月，王国斌、王铭铭、王柯三位教授以特聘讲座教授身份正式加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同时，王铭铭教授兼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和特聘研究员，王柯教授兼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国斌（R. Bin Wong），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美籍华裔，尔湾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本科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系，进入哈佛大学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学派”费正清先生和孔飞力先生，在欧洲史和中国史的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他辗转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用历史学解读经济学，用欧洲史解读中国史，是崛起的“加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王铭铭，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兼副主任，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福建泉州人，1962年3月14日生。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导。1987年10月—1993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1985年9月—1987年6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1981年9月—1985年6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本科生。

从研究生期间开始译介西方人类学理论，博士论文期间专门研究城市仪式、时间—空间象征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博士后期间转向乡村研究与理论研究，曾在闽台三村、一市中从事长期田野调查，撰述大量中文论著，致力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区域研究、宗教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有研究专长。目前除继续既有研究脉络外，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异文化叙述及海外民族志及文化展示研究。现已发表中文学术专著18部，英文专著1部，译著3部，主编论文集7部，及大量中外文核心期刊论文。



王柯，Born in 1956, China. Graduated from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1982 with B.A., in 1987 with M.A. in Law. After teaching at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nd then serving at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ved to Japan in 1988. Graduated from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kyo in 1991 with M.A., in 1994 with Ph.D. Before being appointed to the current position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at Kobe University in 2001, had been teaching there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since 1996.

A Study of the East Turkistan Republic, Muslims and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Suntory Award, in Japanes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5, The No. 18 Suntory arts and sciences Prize), People and Nation-Genealogy of the Concept of China as a Multiracial Nation (in Chinese, China Society Science press, Beijing, 2000), Nation Building and Ethnic Identity in 20th-Century China (in Japanes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2006), Multiracial nation China, (in Japanese. Iwanami Shoten, Tokyo, 2005), Toward the Tianxia (天下), the Step of multiracial nation China (in Japanese, Noubunkyou Publishing Co., Tokyo, 2007), East Asia community with cultured common recognition, the recognitions by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s scholars (Edited by Wang Ke, in Chinese, People Press, Beijing, 2007), also the co-author of numerous papers.

二. 学术成果

1. 邓正来教授特约主编英文版《中国政治学刊》专号出版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14, Number 4, December 2009, ISSN 1080-6954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I)

Guest Editor: Deng Zhenglai, Dean and Professor of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Editorial Not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Deng Zhenglai

Research Articles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Yang Zhong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on China: Making the Most of Diversity
Björn Alpermann

Choices for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ical Positivism or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Jon R. Taylor

The Perestroika Movement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ts Lessons for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Shelley Rigger

Research Not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China: An Issue Area in Review

Fengshi Wu

Book Reviews

David Shambaugh and Michael Yahuda,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ALLEN CARLSON

David M.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GREGORY J. MOORE

Kevin J. O'Brien,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JAMES REILLY

China's Transformations: The Stories beyond the Headlines by Jensen and
Weston (eds.)

YANMIN YU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CHARLOTTE P. LEE

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RONALD A. EDWARDS

Pamela Tan, The Chinese Factor: An Australian Chinese Woman's Life in China
from 1950 to 1979

VINCENT KELLY POLLARD

2. 邓正来：“闭关”只为哈耶克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9日，第9版。

选摘：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引进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先哲们打仗，支持传统思想的人则拿着先哲们的思想跟西方学者打仗，而他们自己却是不存在的，当下的中国正是在这种争论中被丢失了。

读书报：为潜心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您从1988年开始实施“学术闭关”行动，在长达五年多的“闭关”期中，您基本拒绝了各种国际国内学术活动的邀请以及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约稿，只是阅读、思考、翻译和著述。学术大家如此之多，同是自由主义论者的学者也很多，为何您“闭关”只为哈耶克？

邓正来：我之所以对自由主义理论感兴趣，主要是与我本人一直关注的一个基本哲学问题密切相关，即人类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问题。经由长期的研究，我大体上认为，知识具有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的力量。这意味着，那些所谓“正当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其本身也许并不具有比其他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正当的品格，它们有可能是透过权力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更可能是通过我们不断运用知识对之进行诠释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秩序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即后者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者所赋予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建构或重构当下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秩序，首先要对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我为什么选择哈耶克的理论而没有选择其他论者的理论，原因太过复杂，很难在这里详尽表述。但是，简单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的渊源极其深厚，它源出于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尤其是休谟的哲学）传统，是20世纪西方论者以古典自由主义方式阐释人类社会秩序（亦即他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当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更与社群主义、功利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理论有着繁复的论辩关系；二是中国论者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的不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对他理论的信奉程度。

3. 孙国东：哈氏思想在中国的流播史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9日，第9版。

选摘：无论是对作者本人，还是对中国而言，哈耶克（1899—1992）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都具有特别的意蕴。哈氏在该书中发出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计划经济的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的警示，不仅奠定了他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VS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一20世纪最大的意识形态之争中的特殊地位，也使其与计划经济模式及其实践转型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哈氏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享有“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自由主义辩护士这一过于鲜明的身份不仅常常让人遗忘了他作为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身份，而且始终使其在中国的命运因人们对待计划经济的态度的不同而不同。

4. 邓正来: 《哈耶克读本》出版

哈耶克读本
邓正来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第1版

目 录

- 编者前言 邓正来
- 一、“知与无知”的知识观
- 经济学与知识
 -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 自由文明的创造力
 - 自由、理性和传统
-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
- 个人主义: 真与伪
 - 社会科学的事实
- 三、自生自发社会秩序观
- 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
 - 关于行为规则系统之进化问题的若干评注
 - 一个人行为规则与社会的行动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
- 四、自由与法治下的自由
- 自由辨
 - 法律、命令与秩序
- 五、法律和规则观
- 内部规则: 自由的法律
 - 外部规则: 立法的法律
 - 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
- 六、否定性的正义观
- 正义的探求
 - 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
 - 社会正义的返祖性质
- 七、有限民主观
- 民主权力的分立
 - 一种宪法模式
- 附录 跋文
- 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 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



三. 学术讲座

1. Steven W. Lewis 教授主讲 “公共空间与公民身份的媒介: 上海与华盛顿比较研究”
学术名家讲坛 (七)

2009年12月4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学术名家讲坛”第七期迎来了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亚洲问题研究员、莱斯大学赵廷箴与怀芳亚洲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Steven W. Lewis教授。Lewis教授在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全球化、中国问题、能源问题与公共政策、媒体与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研究。

本期讲坛由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博士担任主持人。首先,林博士欢迎Lewis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学术名家讲坛”演讲,接着他向到场的听众们介绍了Lewis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新雨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沈国麟博士。

主讲嘉宾Lewis教授发表了题为“公共空间与公民身份的媒介:上海与华盛顿比较研究”的演讲,首先,Lewis教授探讨了公共空间中的广告是如何在发生地域性变化的,他试图以一种社会科学的进路将广告作为媒体研究的主体,将之放到更具普遍意义的宏大的社会转变趋势下进行反思。进而指出这些广告是一些新的集体认同形式,具备了全球化的背景,共享了国际媒介企业,在一定意义上比广播和电影媒介更具对本地传统的反思性。从人文主义化的进路,指出广告日益成为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不断发展下的更具潜力的媒介,日益成为新形式异化的背后机制。

其次,Lewis教授探讨了广告和作为公共空间的地铁站两者的关系。指出地铁站有以下几个属性,即地铁站可以作为城市和国家发展的符号,作为全球城市现状和世界主义的符号,作为政治舞台,作为心理取向的标志,作为个人空间,作为社会化和消费化的空间等等。详细介绍了从1998年开始的针对亚洲各大城市的广告调查,包括北京、福冈、香港、高雄、首尔、上海、新加坡、台北和东京等城市。

再次,Lewis教授区分了广告的三种类型,包括针对个人和家庭的商业广告、针对组织和政府的商业广告,针对个人和群体的公共服务广告。Lewis教授举出了数十幅从上海和华盛顿采集来的广告实例,对两个城市的广告进行比较,指出:其一,上海具有更多针对个人和家庭的广告,其二,华盛顿有大量针对公司和政府的商业广告,其三,上海的公共服务广告是由政府制作的,华盛顿的公共服务广告是由政府、非盈利组织和公司制作的。

最后,Lewis教授就城市公共空间广告的形态和影响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更多地进行现场调查研究,并将广告的变化放到商业社会公共服务这一领域中来研究等等。



评论嘉宾吕新雨教授指出Lewis教授的这种跨文化比较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并提出了四个问题:其一,就选择上海和华盛顿进行比较研究的合理性提出疑问,广告所营造出环境在中美城市表现的异同,是否其背后还有更根本的原因?

特别就社会稳定和广告宣传以及暴力制止和广告效应的这两个关系而言,中美城市在原理和机制层面有何区别?其二,将广告反映的真实



度与所谓公民素质紧密相连,是否还应当考虑到城市的不同定位和结构以及其背后的不同的文化解释机制?其三,公共服务和公共广告的区别事实上并不明显,广告本身具有公共性,更是主办方自身意见的表达,其中的界限很难区分,在这一情况下,从公共服务的角度看待广告,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其四,对广告进行记录是研究的第一步,随着研究的深入,广告背后价值系统及社会机制都将纳入我们的视野。

评论嘉宾沈国麟博士针对 Lewis 教授的演讲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对于上海和华盛顿广告问题 Lewis 教授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下一步的工作或许放在深入观察和原理机制的研究层面更为合适,具体而言,从对广告来源和广告主题的考察是否可以得出上海更加期待自身成为一个国际化跨文化城市?中国传统文化在广告背后的体现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但其研究还有待深入。



Lewis 教授对上述评论做了简短的回应,之后在场听众就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访引起的中美关系变化、广告的社会效应、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世博会的广告设计、社会学选题等方面提出了问题,主讲教授对上述问题一一做了认真的回应。

主持人林曦博士对全场讲座做了学术总结,指出这期讲坛开放出了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即诸如地铁这样的公共空间以及广告等媒介形式在公民身份的塑造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公共空间对于潜移默化的公民教育有什么样的作用。他提到英国经济学家 T·H·马歇尔曾就这些问题已经进行过阐述,而结合今天 Lewis 教授的演讲,至少还有如下问题可以继续讨论:讨论公共空间的作用是从规范性还是从实践性层面来谈?两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对公民身份的讨论角度是权力和责任的角度还是公民信仰的角度,亦或是行为主义的角度?从推动行为的改变来看待公共广告,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高研院研究人员孙国东、沈映涵、陈润华、郭苏建、邓正来等参加了本期讲坛。

2. 王国斌教授主讲“中国历史对社会理论的挑战与贡献”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二十二)



2009年12月9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二十二期邀请王国斌教授担任主讲嘉宾。王国斌教授现为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加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史(主要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曾出版《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养育人民:1650-1850年间的国营民仓系统》等著作。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坛。首先，邓教授欢迎王国斌教授在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他向到场的听众们介绍了王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胡守钧教授。

主讲嘉宾王国斌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对社会理论的挑战与贡献”的演讲，首先，王教授讲到社会理论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逻辑，指出以现代化为指向的一部份欧洲社会理论并不能分析欧洲之外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因此很难确定欧洲与其他地方区别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其后，他以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这本书为例，证明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某种以空间差别代替时间性的研究。而这一理论起点或背景的选取使得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欧洲之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发展，仅仅只有三种可能性的历史，即要么模仿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变化，要么借用欧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来发展，要么变成欧美国家的殖民地。



其次，王教授指出当前我们的社会理论研究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批评让我们知道有不少情况不适合这种理论的说法，但是还没有能够代替它的新的社会理论”，“我们还不会解释世界历史变化，也缺乏一种社会理论能够把欧洲历史变化当作一种变化而已”。造成这种情况有三种原因：第一，欧洲史的变化还会解释一些成功的情况，譬如日本的经济发展；第二，现有理论好像也会解释一些失败的例子，譬如中国清末没有经济发展；第三，当代的发展可能性都跟目前世界经济与政治有明显的关系，这很容易造成我们无视历史。

再次，王教授追问为什么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存在不同点这个问题，他分辨了利益和信仰在中西方具有的不同作用。大致来说，西方把利益当作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要因素，中国把信仰当作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要因素；也可以说，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机构或制度有不同办法来表达利益与信仰。更具体讲，西方政府对于人民关系以利益性判断为基础，善于判断和解决人民之间竞争性利益问题，但难以有效解决人们的共同利益问题；中国政府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很好地解决了人们的共同利益问题，但不能很好解决人们之间的竞争性利益这个问题。

最后，就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王教授提出未来政府既要解决好个体利益问题，也要能解决好共同利益问题，西方社会科学对西方的长处了解较多，但对中国了解不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性的长处是从历史中出来的，他同时给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贡献与一个挑战，这一挑战恰恰需要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回应，如果我们能采取多元的视角或许更有可能做出新的贡献。



评论嘉宾姚大力教授指出：这是王国斌教授对西方中心论影响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挑战，这个讲演是对其 13 年前出版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中的观点的重申、强调、改善与更新。他主

要讲了三点内容：第一，参照《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有以彭慕兰、李伯重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如果同意他们，那么我们将会提出的问题恰恰是“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会在西欧的某些地方产生并发展起来”，而不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对前一问题的回答将开放出某种“互为主体的比较、双轨制的比较”，也即王国斌教授指出的“对称式的观察”，这不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第二，西学东渐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但因为两地固有的政治传统完全不一样，包括国家制度、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等等，导致了需要、也已经采用了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本身的惯性出来，王国斌教授比较了中西双方各自从传统到近代发展的不同路径及理论。在国家权力扩展的同时，欧洲的情况是社会与个人关系的重新转变，包括国家和社会在机能上的分离，各级政府在政治上的独立发展等等，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在政治上相互制衡的机构，亦即走过了从利益到竞争到利益的协商这一系列过程。在中国，社会以信仰为中心，形成了为人普遍接受的宏大政治形态，国家机器与精英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离开来、互相制衡的，这也促使了国家履行家长式责任，管辖范围较广。这两种传统形成了不同的路径依赖，就目前而言，似乎越来越有更多的相同点。第三，民主社会制度建设的前进方向，在不同社会历史传统的影响下，会有不同的模式。就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王教授是持乐观态度的。民主作为一种原则、程序或制度体系，随现代国家的观念同时传入中国，不是中国从来就有的。所谓依靠民主能解决共同利益的问题，相应的传统中民本思想同样可以体现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那么，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判定某种理论表达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和利益。此外，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在未来中国社会改革中还有没有积极的意义，这也值得探讨。民主理念和制度形式由西方传入，那么中国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必须界定民主最基本的规定性，以及体现在这种规定性之中的民主理念和西方的制度形式予以正面的严肃的考虑。

评论嘉宾胡守钧教授主要讲了四点内容：第一，从可道之道的角度谈了理论的解释力问题，可以演说的理论并非道本身，在神坛上的是社会生活而非理论。作为解释的理论，包括科学理论对实验现象的解释，社会理论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有极强的解释力。第二，对制度学派提出了质疑，学界似乎越来越看重所谓制度决定论，这其实是有问题的。从社会共生论的角度，考察主体、资源和约束这三个要素，作为约束的制度，是兼有因果的，其产生是个结果，产生之后可以做为其他社会发展的原因。对制度的评价，其标准是人权观念，社会进步的表达是共生关系的优化，根本上是资源分享趋向合理。对制度变迁的原因可以从斗争和妥协两个角度来考察，特别是针对保护公民权、保证公权力的公平性、廉洁性和有效性而言，中国传统的明君、贤相和清官的政治结构依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善治的达成可以局部移植西方传统政治制度的优良经验。第三，王教授这种对中西两种制度的比较方式开放出了较多的可能性，值得我们借鉴。第四，赞同王教授提出的未来是中西双方就善治问题互相学习与借鉴的这一预见。



王国斌教授对上述点评做了回应，指出治理经验与历史紧密相关，但从大的趋势上来看，中欧政治治理模式发展存在着一个相互趋同的过程。

在互动和讨论环节，到场的听众们提出了如下质疑：是否可以将西方基于利益的治理方式理解为基于基督教信仰、新教伦理，同时是否可以将中国基于信仰的治理方式理解为基于家族利益的治理方式，是否可以做这样的对换？社会理论可以大致分为描述性的（descriptive）理论、解释性的（explanatory）理论、规范性的（normative）理论，作为史学家，您在谈论了大量中欧政治经济发展经验之后在最后提及未来发展趋势时，对中欧双方均作了价值判断，以试图集合两者的优势，那么这一内在演化的逻辑是如何成立的？以结果论的思维方式来看，我们对30年来发展的乐观看法促使了我们对之的研究，那么这一模式是否能超越似乎已然在先的结果本身？从特殊性提炼出普遍性的同时是否遗忘了特殊性本身有效的成立条件？现实上殖民色彩的消退对学理上的研究有多大影响？等等。

王国斌教授一一认真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他特别强调规范性问题主要是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科学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反思性上是区别于哲学的。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指出如何从实然的分析当中推出应然的结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孙国东、沈映涵、刘清平、纳日碧力戈、吴冠军、陈润华参加了本期讲坛。



3. 文贯中教授主讲“在大饥荒50周年之际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这场人祸的成因和教训”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二十三）

2009年12月18日下午3: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了第二十三场主题讲座。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先生担任主讲嘉宾。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学勤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



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乐天教授担任评论嘉宾。



演讲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他欢迎文贯中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向到场师生简要介绍了文贯中教授的学术经历及主要研究领域，并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朱学勤教授和张乐天教授。

随后，文贯中教授为大家进行了题为“在大饥荒50周年之际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这场人祸的成因和教训”的讲演。他充分利用杨继绳等学者作品中的翔

实数据，向听众阐述了公共食堂政策触发和加剧饥荒的机制。他指出，由于公共食堂对口粮的强制性集体化和严重的粮食浪费，导致饥荒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的情况下发生。并且公共食堂降低了生产率，在克扣社员口粮的同时，为农村干部多吃多占提供了便利，使得饥荒更加严重并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公共食堂的兴办带来一系列恶果，例如农村干部通过操控口粮而拥有了对社员生死予夺的权力，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清剿，甚至连逃荒权都被剥夺等，这些因素又反过来愈发加重了饥荒的程度。



文贯中教授还论述了退堂权的复得和饥荒的终结。公共食堂的解散立即提高了农民口粮的消费效率，自留地及家庭副业的合法化为农民及时提供了食物补充。使得1961年里，在农民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低于1958年的情况下，大饥荒戛然而止，生产逐渐恢复。

最后，文贯中教授论述了研究大饥荒问题的现实意义。他通过对比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农业改革措施，希望中国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土地制度改革中能赋予农民更多的退出权。并肯定了对于大饥荒问题的研究对于早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评论嘉宾朱学勤教授首先肯定了研究大饥荒问题的学术性和现实意义，并赞扬了文贯中教授等学者的努力，使得大饥荒问题逐渐脱敏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接着他联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从显微镜的微观角度和望远镜的宏观角度对中国的大饥荒问题做出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中国的大饥荒问题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即饥荒主要由信息封锁和粮食发散渠道不通畅这两个因素导致）来解释既有效也有限。

中国大饥荒问题的教训在于，如果国家的强权力量能够伸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打破最基本的家庭单位，剥夺个体维持肉体生命的权力，那么社会必然会萎缩和停滞。最后，他总结到，只有释放社会退出权，社会焕发生机，善治社会才更容易达成。

评论嘉宾张乐天教授对于退堂权导致大饥荒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第一，他根据手头拥有的“四清”时期的数据，认为公共食堂时期农村干部多吃多占的程度并不如想象中严重。第二，他主张大饥荒结束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退出食堂，而在于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变革，如允许自留地，“挖边”等。虽然这些产出不计入生产队的会计账，但的确有效增加了



产出，缓解了灾情。最后，他总结到，六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行动是“均平富”的理想主义实践，公共食堂等制度破坏了乡村社会基本的生活秩序，打破了农村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即家庭。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分离导致了农民基本行为方式失范，使得农业生产水平下降，最终导致了大饥荒的发生。公共食堂制度只是这整体制度的组成部分，的确对大饥荒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构成最根本的原因。



产出，缓解了灾情。最后，他总结到，六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行动是“均平富”的理想主义实践，公共食堂等制度破坏了乡村社会基本的生活秩序，打破了农村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即家庭。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分离导致了农民基本行为方式失范，使得农业生产水平下降，最终导致了大饥荒的发生。公共食堂制度只是这整体制度的组成部分，的确对大饥荒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构成最根本的原因。

文贯中教授主要对张乐天教授的点评做了回应。他认为开荒地、“挖边”等生产自救措施与食堂的解散有直接关系。小家庭分配粮食合法化之后才为农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如果自救措施的产量没有被计入会计账，那么1961年农民的实际粮食消费量会比已有数据显示的更高，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饥荒在的人均消费量较低的时刻反而缓解和终止。



听众们反响热烈，踊跃提问。比如：生产队对公社劳动力统一实行工分制管理制度导致农民无暇自救与大饥荒有没有关系？大饥荒的教训是否在于政府的强势手段将导致民间活力丧失和社会萎缩？农民在历史上是否曾经拥有过退出权等自由选择的权力？当时的粮食统一征购政策是否也对大饥荒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等等。

文贯中教授等一一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指出由于农民可能在规定劳动时间内积极性不高或伪装积极，而在自留地上勤奋劳动，因此工分制度并非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朱学勤教授总结道，如果过于相信政府看得见的手，任其塑造和改组社会，将导致社会丧失活力。只有与大地、社会和人性言和，使社会复活复归、自我生长，社会才有可能繁荣兴旺。

最后，邓正来教授用一句话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假设文贯中教授给出的数据真实，人民公社无法替代劳动和市场分配资源，为什么需要反复主张个体根据自身意愿选择进入或退出的权利。归根结底，大饥荒问题其实是解决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问题。



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孙国东、吴冠军、陈润华、纳日碧力戈、刘清平等参加了讲座。

4. Govindan Parayil 教授主讲“可持续未来之科技”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二十四）

2009年12月18日晚7: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四期由Govindan Parayil教授担纲主讲，题为“可持续未来之科技”。Govindan Parayil教授现任联合国大学副校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就职于奥斯陆大学社会科学系、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康奈尔大学、伊利诺斯理工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著作颇丰，现任多家国际期刊编委和国际研究机构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印度观察员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会长Sunjoy Joshi和副会长Samir Saran作为嘉宾列席其中；同时参加此次讲坛的还有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纳日碧力戈、刘清平、陈润华、吴冠军、



孙国东。

Govindan Parayil 教授的演讲主要沿以下主线深入展开。首先，他指出当今世界两极分化，科技正是富足和进步背后的主要动因。科技的发展能够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科技能够改善人类社会的卫生、医疗、教育等状况，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此基础之上，Govindan Parayil 教授介绍了联合国大学及其高研院所坚持推广的“以科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和策略。他指出，要应对可持续发展在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即贫困问题、气候问题和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科学技术的自由共享和流通十分重要，特别是贫困国和富国之间的沟通和流动。

为此，他从历史的角度阐明了科技共享和流通的深远影响和必要性。以中、印为例，二者作为文明古国，其重大历史发明的传播对欧洲社会、美国和后来日本发展都所产生的惊人的推动作用。他认为，鉴于发达国家的腾飞史——借用他国科技成果来发展自身，今日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被赋予同样的机会和权力。

最后，他指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科学技术的公平流通和共享，而联合国大学和旗下所属高研院正是致力于促成政府之间、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协调行动，从而实现科技的自由、公平流通，推动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实现。



在场嘉宾对 Govindan Parayil 教授的演讲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评论嘉宾郭苏建教授指出，Parayil 教授的演讲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科学技术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有目共睹，但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亦不容忽视。首先，科学技术的后果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和不确定性，可能会对人类生存的社会和环境产生破坏作用；其次，发达国家不是慈善家，其不会轻易与人共享自身投入所换来的科技成果；更有甚者，科技的“共享”可能会演变成为发达国家操纵别国的手段和工具。另外，郭教授认为，科技不是万灵药，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对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重要影响，如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制度安排和治理、文化传统和历史因素、市场机制等等。

针对郭苏建教授提出的问题，Govindan Parayil 教授做出了如下回应：首先，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风险的科技，如何来应对和规避这些风险和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现代人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慎重和过去累积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科技共享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减少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信息行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次，对于人们对科技的“不正当”的利用（如用



来控制他国、发展军事力量等），这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是使用者的问题。最后，对于“有诸多因素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Govindan Parayil 教授持完全肯定态度。

高研院专职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纳日碧力戈在 Govindan Parayil 教授演讲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问题

(1)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有其生存极限点，过了这个点，危机就会导致该系统的消亡。为此，人类该怎样来应对？(2) 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存在差异性，由此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例如对“世界公民”的理解。在科技和信息共享的过程中，人们是不是要在统一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再采取行动？Govindan Parayil 教授回应道：(1) 首先，人类要明确极限点的存在和位置，相应调整、转变自身观念和行为；同时，由于社会差异的存在，人们在应对危机中所承担的责任也存在着差异性。(2) 应尊重多样性的存在，不必要遵循同一种认同。



印度观察员基金会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会长 Sunjoy Joshi 指出，科技的发展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它经历着社会优胜劣汰的选择。该基金会副会长 Samir Saran 认为，现在社会中存在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弱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进而他询问联合国大学对这个现象有没有相应的关注和行动；同时，他指出 Govindan Parayil 教授在讲座中有着明显的“东西二元分化”立场。Govindan Parayil 教授十分同意 Sunjoy Joshi 的观点，认为科技的发展不是处在真空中，而是有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新的发展模式要积极地适应当今的社会背景，以一个更加开放的姿态在市场化条件下共享科学技术和知识。针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相对较弱势头，Govindan Parayil 教授提出联合国大学和各个学术组织有义务和责任提倡和推动学术资源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合理分配，恢复社会科学旧有的荣耀。对于“东西二元分立”的立场，Govindan Parayil 教授认为这是过去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必将发生改变。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询问 Govindan Parayil 教授关于“科学和宗教关系发展趋势”的见解，Govindan Parayil 教授说，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但是也能实现共存。二者有着共同的根基，即都是对世界和生活的一种解释方式。人们可以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宗教。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陈润华提出了“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好的社会”的疑问，认为 Govindan Parayil 教授所指的“好社会”是以西方社会为蓝本的，强调社会财富标准，具有功利性和片面性；同时，他认为 Govindan Parayil 教授的科学观有很强的西方科学观色彩。Govindan Parayil 教授在回应中非常赞同其关于“好社会应该有多重衡量标准”的观点；同时指出虽然西方社会在近现代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科学不是西方的。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简短且发人深思的总结。他指出，现在人们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现有社会存在着不可持续发展现状，这种不可持续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所致。然而，问题在于，要解决这种不可持续的现状、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所诉

诸的还是科学技术。那么，这前后两种科学技术知识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在“进步观”支配下企图控制人类世界的知识？问题留给世人思考，而这种启发意义也正是本次讲座的最终目的。

5. 汪晖教授主讲“东西方学术思潮”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一）

2009年12月20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一期由汪晖教授担任座谈嘉宾，主题为“东西方学术思潮”。汪晖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参加本次席明纳的学者还有：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教授顾肃，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高研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吴炫。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席明纳。他首先为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宣布了席明纳的讨论规则和流程，并重点介绍了座谈嘉宾汪晖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理论关注点。

接着，汪晖教授做了二十分钟的发言。他主要围绕伴随民族国家建制而出现的两个问题：

第一，从翻译角度叙述了“宗主权”（suzerainty）和“主权”（sovereignty）的界定及关系问题。英文世界最初用suzerainty来描述奥特曼帝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概念被用于表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suzerainty也被用来界定亚洲世界曾经存在的非常复杂的朝贡、册封和藩属关系。事实上，帝国主义意义上的宗主权和原来亚洲地区朝贡、册封和藩属关系有着重要的差别，两者并非是同质的。对sovereignty的界定要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打破这类概念与中国相关概念的非学理性对译，从而了解特殊的政治文化所提出的问题，或许才有可能开放出一个解释上的主动能力。汪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针对区域地区间的特殊关系进行研究，开放出一些新的范畴和视野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这样一来，或许就可以改变简单地仅透过欧洲民族性知识来解释复杂世界这一做法。



第二，如何解释当代中国走过的这条独特道路？事实上，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作为主权的政治体的形成。通常来说，民族国家体系是在二战后逐渐成型和规范化的，比如联合国是典型的承认的主权体系；但是，仔细分析，有多少国家具有真正的主权性？西方有些政治家用“勃列日涅夫定律”来描述部分东欧国家的“不完全性主权”状态，确切地说，北约所属的一些国家、日本、韩

国等也一定程度上处在主权并不完整的形态。那么 sovereignty 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政治进程中，国家和特殊利益之间形成断裂，特殊的政治形态产生了特殊的主权形态，对中国道路的普遍认同是与这一点有密切联系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在现有道路的持续行进中，政党组织、政治结构、社会运行的实质性变化渐渐形成了某种“去政治化”的趋势。汪教授重点指出，普遍认同问题关系重大：回顾历史，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其认同并不是通过一般的民族认同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政治过程建立起来的；观察当下，如果“去政治化”进一步深入的话，那么认同的问题将会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所以，如何从学理上真真切切地回答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无法回避的挑战。

邓正来教授提醒大家：讨论不要以学科为导向，而要通过问题为导向 (issue-oriented) 的方式，把问题背后可能的知识脉络和学理逻辑挖掘出来，希望大家能对汪晖教授的发言做出各自的学术解读。

在第一轮讨论中，在场的学者提出了如下问题：法理学上的主权概念和政治现实意义上的主权含义是有区别



的，两者关系究竟应如何认识？对政治承认这一概念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进行定义，是否已经囊括了政治承认所蕴含的所有可能性？当下中国的历史存在的最为根本之依据的落脚点是什么？中国形成所谓的民族国家，其间存在的基础性的支撑力量是什么？对于主权而言，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感受差异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某些国外汉学家的民族问题研究，一方面忽视了中国的首都是不断在迁移的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形成了将中国的统治者简单界定为汉族的这一错误印象，那么是否存在这一可能性，即传统国家并非基于现代主权观念，或许更容易接受外来王的统辖？从翻译上讲，借鉴蒙古族和汉族的交往历史对我们认识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何帮助？历史的偶然性对于有限主权和绝对主权的差异论是否开放出了新的解释？近代中国救亡图存问题和民族问题、乃至文化问题有何关联？我们对宗主权和主权的过度关注是否会遮蔽民族国家已经形成的文化多元问题？如何认识和理解在主权形成过程中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性？等等。除此之外，大家还对国际法知识上的主权概念究竟是什么进行了争辩。



汪晖教授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主要强调：第一，诚然，欧洲民族主义知识体系是十分丰富的，却也在我们处理各种问题上形成了许多钳制，那么在规范意义上除去民族国家这一系列知识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知识可能性？第二，在独立自主意义上谈论的主权性是与政治文化、政治基础有密切关联的，其所提出的去政治化过程是指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深入，原有的支撑普遍认同的基础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是否产生了危机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谈论的问题，它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乃至“民主的危机”是有很大联系的。

第二轮讨论更加激烈，与会学者主要提出了以下问题：如果说吴三桂当然是汉奸，那么为什么纪晓岚不是汉奸呢？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的时候提出留发或留头的选择，为什么一部分所谓汉族人选择了留发？民族、国家、主权的认同感在中国疆域内有何特殊性？保持国家认同感为什么要去采用文化同化这一思维方式？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找到经验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之间的平衡点？汪教授所倚重的“京都学派”的论述是否从其当时的历史形态和“亚洲共荣圈”建设的思路中脱离了出来？等等。



汪晖教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第二次回应。他指出：其一，京都学派从东洋历史和比较历史的角度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即不是把现代性看成一个单一起源的叙述，这一角度是有意义的。但京都学派对东洋现代性的描述大致都是模仿欧洲现代性的思路，这其中的进化论和历史目的论是要被批评的。如果把唐宋视为近代，那么元代和清代的定位就成了问题，特别清代既有郡县制国家的模式，也有朝贡藩属的复杂关系模式，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也激发出了一系列现代中国面临的复杂难题。其二，我们的自我认识并未在西方的架构之下，西方对我们而言是内部的。例如，正如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王国斌教授提出的那样，在民族主义的参照之下观察中国史和欧洲史，欧洲和中国似乎均有将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一致起来的趋势；但有趣的是，在中国，同构性和差异性是并存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极为丰富，远远超出了我们对政治体和文明体的认识。



接着，学者们又围绕下述问题进行了讨论：自强不息的“强”着重彰显的是什么？文化主权的建构有哪些问题值得思考？主张“和而不同”是否认同不主张和而不同者的观念和做法？为什么近代以来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都主张废除其国内的长期使用的汉字？等等。

在席明纳的最后环节，在场听众们也提出了如下问题：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用西方民族国家界定中国在理论上产生矛盾和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三十年道路和全球化趋势中占有什么地位？对某个疆域统治的最高权即主权概念和经济是否有关，为什么？如何界定文化概念上的中国？中国历史上民族认同感的建立有何特色？等等。



及到场听众朋友们。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简短的总结。他指出：这种席明纳形式的重要之处在于大家都能以学术的方式提出和分析各自的观点，通过相互理解和辩论从而加深各自对问题的认识。邓教授代表高研院再次感谢了座谈嘉宾汪晖教授和其他诸位嘉宾以

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吴冠军、刘清平、孙国东、陈润华、林曦、沈映涵等作为与会学者参加了本次席明纳，并都做了发言。

6. 王铭铭教授主讲“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二）

2009年12月22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在光华楼东主楼2812“思想者学苑”举行。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铭铭担任本次席明纳的座谈嘉宾。

本次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主持,应邀参加会议的嘉宾有: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乐天教授,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江华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潘天舒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巫达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陶格图副教授,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佩国教授,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亦农博士,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朱剑峰博士、沈奕雯博士。高研院研究人员孙国东、陈润华、沈映涵、林曦、邓正来参加了席明纳。



纳日碧力戈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主讲人王铭铭教授近年来为国内人类学界做出的杰出贡献,并通过当前对“中国”一词认知的讨论引出本次席明纳的主题。

随后,王铭铭教授为大家作了题为“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的主题发言。首先,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对“华夷之辨”这一问题有两种流派。这两个流派在极端的时代衍生出来两种政治哲学,一种是华夏的,一种是蛮夷的。在没有遭受侵略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心态是互动并存的,在每个人内心都有可能存在。总之,我们不能把“华夷之辨”仅看成是固定的一种形态。



其次,他批判了当前国内和西方汉学家,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对“华夷之辨”的各种错误的理解。当前西方汉学界受到拉铁摩尔以“长城内外”思考范式的影响,跳过少数民族问题,把“华夷之辨”问题看作是二元对立的;而国内人类学界继承了这种观点,也陷入“华夷之辨”二元化困境。

再次,王铭铭教授提到自己最近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与物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西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进而思考一种人与物结合的世界观。正如福柯所提醒的,我们不应受近代以来人文科学分类体系的制约而忽视探讨人与物的结合。接着,他以帝国文人对中国皇帝世界的“塑造性”书写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最后,王铭铭教授指出我们太急于用西方的理论理解中国,而忽视了对理论的“名”如何贴切研究对象的“实”这一问题的反思,比如“中国”这一概念。对此,人类学这一学科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确定什么是“当地的”。这就是“地方性知识”这一理论讨论的问题所在。王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简单地用西方

人类学理论脉络中生产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观察中国，就易于陷入民族中心主义的误区，而这就走上了人类学的误区。我们只有从总体上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才能产生有学术意义的讨论。

就王铭铭教授涉及的问题，现场嘉宾和与会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并展开相关讨论。

纳日碧力戈教授针对“地方性知识”问题，提出下列疑问：为什么少数民族在中国没有多少研究，但日本却相反？地方性的知识要不要包括少数民族的知识，这些知识要不要和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等等



潘天舒教授指出美国的民族政策导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要有成功之处，我们是不是必须用美国的方式来思考这一问题？根据王铭铭教授提到的中国皇帝面临的两方面问题，潘教授提出考古器物是不是可以对思考“华夷之辨”问题提供思路？



张乐天教授认为，以“地方性知识”研究一个社群，背后预设小社群的问题与我们关注的更大范围内的大问题具有同构性。张教授以实例说明这一预设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地方性知识”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诸如此类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能提供给我们认识世界的普遍知识与对自身生活的意义。

陈润华博士则通过梳理中国“华夷之辨”从“三代损益”到“五德循环”的历程，强调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看“中国”的问题，要有整体与统一的时空观。沈亦雯博士以台湾为例，提出我们如何突破研究者自身身份与研究对象地位之间的差异这一困境。孙国东博士认为在中国讨论蛮夷问题不可避免具有政治性，其背后都预设了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前提；此外，中国的“华夷之辨”所隐含的“文明优越论”预设也是值得警惕的。朱剑峰博士提出如何使人类学研究中的“other”成为“mirror of mirror”来看？巫达教授、张江华教授与张亦农博士也根据各自的田野调查经验表达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邓正来教授则提醒大家注意不应仅仅因为研究议题的原因，而把对研究者身份的思考单方面与族群问题勾连起来。研究者身份的获得更多的是与整个社会体制的引导有关。重要的问题其实是，类似研究者身份这样的困惑到底是他们自己的困惑还是他们背后知识脉络的困惑。以格尔茨为例，邓教授指出，“knowledge”一词具有非常强的普遍性的诉求，“knowledge”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包含“culture”与“beliefs”。



王铭铭教授对涉及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要重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研究，但是，如果考虑到策略的问题，针对西方中心的学术话语，最有力量的学术语言还是汉语。王教授认为，我们现在对“华夷之辨”及

其包含的道德知识能否用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来形容，如果不可以，理由何在？事实上，人类学界并没有揭示“地方性知识”的复杂性。

最后，纳日碧力戈教授总结了整场席明纳，感谢各位的参与和讨论。并希望能通过跨学科的交流和研究，为长三角的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7. 纳日碧力戈教授主讲“民族生态新观察” 专职研究人员就职讲演（三）

2009年12月24日下午3: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纳日碧力戈教授专职研究人员就职讲演仪式。这是高研院举办的第三场专职研究人员就职演讲，担任点评嘉宾的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江华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潘天舒。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复旦大学教授、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以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台系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新雨教授。



演讲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介绍了纳日碧力戈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领域。然后，简要的介绍了点评

嘉宾张江华教授和潘天舒副教授，并对他们出席本次讲座表示感谢。

正式演讲开始前，杨志刚教授代表复旦大学为纳日碧力戈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聘书，并与纳日碧力戈教授合影留念。



随后，纳日碧力戈教授做了题为“民族生态新观察”的讲演。首先，他从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以及现实的民族政策展开，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段历史是一部多族共生、多元互动的宏大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值得总结、发掘和宣扬的社会文明生态史，同时这段历史还记录了“中土之民”如何成功地解决一个又一个大国之难，运用地方智慧，借鉴国际经验，建设和谐共同体的过程。接着，他以一种“中西合璧”的哲学思考方式，即以生态或生境的观念和符号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向我们阐释民族生态为什么是由一个“超级三元”及其之下的众多“小三元”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他还认为，由于“超级三元”的“历史记忆”及其统辖作用，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人类社会历史终要呈现“万法归一”的大趋势。

其次，纳日碧力戈教授通过对比中西不同的民族实践观，指出以盖尔纳和安德森的为参照的西方模式以及索绪尔式的“二元对立观”来解释中国问题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的。他认为在寻求民族问题出路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以“大爱”实现多元一体的中国经验。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中国民族共生的历史实践尤其值得重新审视。



那么我们要如何摆脱西方的模式与“二元对立观”呢？对此问题，纳日碧力戈教授提出了他的新看法，是为“民族生态的新观察”。他以民族语言动态共生为例，提出了民族和谐共生是民族互为环境、互为结构以及民族“自我环境”的全新理论，而这一理论也是生物学“结构耦合”理论被引入民族学的结果。并此理论基础之上，与道家思想中的“三元论”以及多元共生的民族生态论相结合，必然为中国民族和谐共生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这也为构建我们自身的理论体系并将中国经验推向世界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评论嘉宾张江华教授首先对纳日碧力戈教授的演讲做出了点评。张教授对纳日碧力戈教授所提出的西方“二元对立观”主导当前研究表示赞同。特别是在民族问题方面，“二元对立观”就很容易使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张教授也对纳日碧力戈教授关于民族生态的研究方式和理论预设提出了质疑。一方面，在二元基础上加入空间作为第三元，这个空间的正当性是否存在。另一方面，各个民族之间的共有民族象征符号如何才能找到。

评论嘉宾潘天舒副教授接着做了学术点评，认为纳日碧力戈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潘教授通过自己在教学中的经验，首先肯定了纳日碧力戈教授演讲中提及的要对西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研究，学界对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关注；其次，用西方理论框架解释中国问题所遇到的难题，在操作层面是有意义的。此外，潘教授还对纳日碧力戈教授提及的空间转换、大生态、小生态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就中国对各民族的象征意义，潘教授简单介绍了核心概念演变的历史。



纳日碧力戈教授对两位嘉宾的点评做了以下回应：空间正当性问题是一个力量对比的博弈过程，而现在的空间正当性已经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如果要打破现实就必须付出非常高的代价。至于共有民族象征如何能找到，纳日碧力戈教授认为只有通过对话与协商才能出现自然地共同象征符号。

在互动和讨论环节，在场听众就纳日碧力戈教授演讲中涉及的问题踊跃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疑问。如民族冲突与和解问题，民族政策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思想如何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智力支持等问题，纳日碧力戈教授都一一做了详细的解答。



最后，邓正来教授以自己的家庭为例，做了简短而精辟的总结，指出：其一，民族之间和谐共美生活方式的前提是尊重各自民族性，要摒弃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否认历史存在的民族性这种错误的做法；其二，民族问题上某些不恰当的保护和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差别性歧视，也弱化了共通性保护，这一行动背后的逻辑是需要学者们警惕的。

特聘教授就职讲演是高研院的常规性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次讲演气氛热烈，观众参与踊跃。纳日碧力戈教授对于民族生态问题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思考为及评论人和观众的讨论开放出了很多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刘清平、吴冠军、孙国东、沈映涵、林曦、邓正来参加了本次演讲。



8. 艾尔曼教授主讲“反思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角色：1500–1800”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二十四）

2009年12月29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二十四场主题讲座。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历史系教授、复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长江特聘讲座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担任评论嘉宾。



演讲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他欢迎艾尔曼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向到场师生简要介绍了艾尔曼教授的学术经历及主要研究领域，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章清教授。

随后，艾尔曼教授为大家进行了题为“反思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角色：1500–1800”的讲演。首先，艾尔曼教授给听众们展示了大量的木版画，试图还原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日本、朝鲜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其次，他认为甲午战争失败是偶然的，因为从技术等实力上对比中日之间差距甚微，人们将战争的失败与文化的失败直接勾连起来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再次，艾尔曼教授详细分辨了格致学在耶稣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详细梳理了苏州岁科考试、明代科技候选人看金榜、中国的天文学、第谷·布拉赫的天体、马戈尔尼的矛盾、基督教传教与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历史事件，既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本身的丰富性，也还原了这种交流和互动的真实内容。最后，艾尔曼教授指出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胜利，文化偏好上出现了从格致学向科学的转向。艾尔曼教授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没有“科学”的，因为这个“科学”是从日本来的，如果中国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打败日本的话，那么中国的科学就是“格致学”。他试图将军事、科学、文化三者的关系分析清楚，取消甲午战争具有的文化失败的象征意义，以形成一种脱离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决定论影响的历史观。



评论嘉宾章清教授回顾了艾尔曼教授来华讲学的经历，指出艾尔曼教授这场讲座在一个宏大的题目下把许多问题很好地贯穿了起来，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艾尔曼教授提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学者以及他们编著的《剑桥晚清史》，背后支撑的是他们所相信的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清史发展思

路，艾尔曼试图就看待中国历史的模式提出新的看法。第二，剖析了艾尔曼教授所谓“后见之明”的说法，主讲嘉宾试图检讨的是甲午战争引发了一种新的历史观，进而观察这一历史观如何影响到我们对整个十五到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的看法。第三，章教授对艾尔曼教授举证的中西科学史上的相关事例做了说明，指出马嘎尔尼使华的历史可以参考何维亚（James Hevia）的著作，主讲嘉宾对日本历史的研究以及对格致问题在清代产生的新的变化的研究都值得学界参考。章教授将本次演讲的最重要问题归结为：我们能否摆脱甲午战争带来的历史观来重新审视十五到十八世纪的历史。

学术讨论环节听众们反响热烈，踊跃提问。提出的问题主要有：历史的书写往往有预设，那么有没有信史，历史不同书写方式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中国有格致学的传统，西方有 science 的传统，那么为何中国没有出现科学史意义上的伟大人物，例如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霍金等？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恰恰是因为缺少了一些东西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斯密陷阱和资本主义萌芽对您的解释还有没有意义？格致学是中国学术上的大学问，你将格致定义为博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是否恰当？如何看待西学中源说？清朝为何对待陆地国家（俄国）和海洋国家（英、美、日）的态度差异如此之大？如何看待日本将脱亚入欧的观念加于其他亚洲国家这一做法？等等。



艾尔曼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指出：其一，按照不同的立场可以分别出不同的历史观，针对中国近世历史，费正清主要分析中国是如何失败的，我主要是分析中国是如何成功，其中均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历史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很难实证化。其二，中国历史上伟大科学家不多的原因与科学培育的制度和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及运用方式有关，考察清代历史可以发现，其所为宫廷格致学院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自主性且于被当时社会重视的程度不够。其三，明朝末年以来，西学中源说有一定道理，也为促动了中国本身制度和思维方式的改革。甲午战争之后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渐渐不再相信西学中源说。其四，从德川时代开始，日本已经开始认为自己的儒学和医学强于中国，这一观念在甲午战争之后成为了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学术总结，指出艾尔曼教授提示出的新的历史观隐含着研究者和历史的关系变化这一指向，关键在于探究为什么人们研究历史的立场和思想角度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究竟是历史材料本身，还是研究者背后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是谁给了我们如此大的自信，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看到的东西这么有自信，甚至忘了我们与我们背后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关系？我们常常以新的历史观来陈述我们看待的材料，这种诠释的可靠性和合法性来源于何处？如果历史是没有对错的，那么我们究竟是先研究历史材料还是先研究历史研究者和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样

式、思想取向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到底如何面对历史研究和历史学？这些问题都需要开放出来进一步思考。

高研院研究人员沈映涵、林曦、纳日碧力戈、刘清平、孙国东、陈润华等参加了讲座。



四. 学术工作坊

1. 2010 年度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启事

学术工作坊（work-shop）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借鉴国际学术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建的一种新型学术建制，其突出特色在于：第一，它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摒弃以学科为分界的传统研究路径，强调对某一特定问题的交叉学科或无学科研究；第二，学术工作坊旨在鼓励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强对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

为了更有效、更深入地推动中国深度研究，从 2009 年开始，我们特在工作坊中设立为期五年的“关键词”特别项目（以下简称“关键词项目”）。该项目由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领衔，以深入研究中国研究领域内的某些“关键词”的方式来推进对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批准，现发布 2010 年度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启事。

一、申报说明

1. 关键词项目分设“中国学术关键词研究”和“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研究”两个学术工作坊，均由邓正来教授领衔。每个工作坊每年由三名成员组成，可以连续申报；参与者独立开展对某个关键词的研究并协作讨论。

2. 申报对象为国内外所有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博士研究生、高校教师或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独立学者等），不限职称和单位。申请者须从事与所选择的关键词相关的学术研究一年以上或有相关学术成果发表。

3. 申请者自行选择“关键词”，并自行制定研究计划。所选择的“关键词”应当对中国研究具有全局性、综合性的价值，对中国人的实际行为或制度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且属多个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比如说，“中国学术关键词”可选择（但不限于）“面子”、“情理”、“关系”、“礼尚往来”等；

“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可选择（但不限于）“权利”、“自由”、“现代性”、“合法性”等（“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是指对中国学者关于西学关键词之研究的研究，鼓励知识社会学路径的研究；关于“关键词”的选择或意义，可参阅[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和[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4. 每个成员的研究期限为 12 个月，并到高研院参加 2-3 次的学术讨论和交流（费用由高研院承担）。研究结束时须按规定提交不少于 1 万字的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该论文可以推荐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表，并择优推荐给相关的英文出版物采用。

5. 每个成员资助科研经费 1.5 万元，具体划拨与使用办法遵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执行。

6. 每个申请者限报一项同年度的高研院学术工作坊项目。

7. 其他未尽事宜由高研院解释。

二、评审与管理

关键词项目的评审坚持“学术平等、匿名评审、宁缺毋滥”的评审原则。

1. 评审分为初审和复审。高研院将首先邀请 5 位评审专家对课题申报进行双向匿名学术评审，确定复审入围名单。在此基础上，高研院将成立专门的学术工作坊答辩委员会，对进入复审名单的申请者进行现场答辩，经全体评委匿名投票后确定最终资助名单。

2. 获得基金资助的申请者应当遵照相关管理办法使用项目成果和资助资金。作品发表时，须在显著位置标注“邓正来教授主持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0 年度‘中国学术关键词研究’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研究’学术工作坊项目”字样。

3. 申请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办理结项手续。

4. 《学术工作坊》负责人须与高研院签订“遵守学术规范合同”。如果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或结项后发现该项目研究存在学术失范或其他与管理规定相悖等问题，高研院将撤销该项目，并予以公示、追回资助资金。

三、申报程序

1. 在高研院 (<http://www.ias.fudan.edu.cn>) 网站下载填写“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表”和“关键词特别项目课题论证表”，按要求填写。

2. 电子版材料发送至 sunguodong0227@yahoo.cn (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申请关键词特别项目”)。

3. 纸面材料请邮寄至：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6 室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收 (邮编：200433)。请在信封上注明“申请关键词特别项目”。

4. 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1 日。

咨询电话：(021) 55665556 (孙老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 2010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申报启事

“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 (work-shop) 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以下简称“高研院”) 在借鉴国际学术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建的一种新型学术建制，其主要特点如下：第一、“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摒弃传统的以单一学科为导向的研究路径，强调对某一特定问题的交叉学科或超学科研究；第二、“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旨在鼓励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强对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基于此，第三，“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遵循和坚持“学术平等”、“匿名评审”和“宁缺毋滥”的原则，对符合报名条件的申报团队一视同仁，在书面评审阶段采用匿名评审的方式，在答辩评议过程中采用评委匿名投票的制度，确保项目以学术水准为唯一标准。

“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实施方式为项目基金资助。高研院学术委员会根据其对中国问题的诊断确定每年度的申报主题。2009 年的学术工作坊立项评审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共确定资助 5 个项目组，每个项目 3 万元，总计

15万元资助经费。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批准，现发布2010年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申报启事。

一、申报说明

1、每个“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由三名有共同研究旨趣和研究同一问题的学者组成；工作坊全部成员资格或为博士研究生、或为博士、或为高校教师，不限职称，不限单位，其中负责人须从事与主题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一年以上并有相关的学术成果发表；

2、研究论题为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或高水平的经验研究。2010年度跨学科学术工作坊申报主题如下：

（1）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可以采用个案分析、文本梳理或理论反思的方式，申报者也可自行设计研究方案。

（2）中国底层问题研究或基层制度研究。

（3）学术工作坊年度特别项目（2010），邓正来教授领衔设计和实施，本主题共两项，一为“中国学术关键词研究”，二为“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研究”。本项目为连续性实施项目，将持续五年。作为一个开放性课题组，项目接受个人申请（申请资格参见本说明第一条），以项目组成员的形式加入课题组。

3、每个《学术工作坊》工作期限为12个月，届时须按规定提交不少于2万字的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高研院可以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表，并择优推荐给相关的英文刊物采用；

4、高研院资助每个学术工作坊项目科研经费人民币三万元，每个学术工作坊年度特别项目经费一万五千元，具体划拨及使用办法参见《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

5、在“工作论文”完成以后，高研院将邀请《学术工作坊》负责人到高研院做汇报讲座，所需差旅及食宿费用列入工作坊项目经费；

6、每人或每个团队不能够同时承担两项以上（含两项）高研院项目；

7、其他未尽事宜依高研院解释。

二、申报程序

1、在高研院（<http://www.ias.fudan.edu.cn/>）网站下载填写“学术工作坊项目申报表”，按要求填写；申请加入学术工作坊年度特别项目组者，请参阅“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启事；

2、电子版发送至ias_fudan@yahoo.cn；

3、纸面材料请邮寄至：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7室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沈老师收，邮编：200433，信封请注明“申报学术工作坊项目”；

4、申报截止日期为2010年4月30日。

三、评审及管理

《学术工作坊》评审原则为“学术平等、匿名评审、宁缺毋滥”；

1、高研院将在收到申报书后邀请5位评审专家对课题申报进行双向匿名学术评审，分为初审和复审。高研院将成立专门的学术工作坊答辩学术委员会，对进入复审名单的课题组进行现场答辩，经全体评委匿名投票后报高研院学术委员会批准，并通知申请者本人评审结果；

-
- 2、获得基金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应该遵照相关管理办法使用项目成果和资助资金，发表作品显著位置须标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0 年度学术工作坊项目”字样；
 - 3、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办理结项手续；
 - 4、《学术工作坊》负责人须与高研院签订“遵守学术规范合同”；如果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或结项后发现该项目研究存在学术失范或其他与管理规定相悖等问题，高研院将随时撤销该项目，予以公示并追回资助资金。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五. 学术出访

1.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邓正来教授和郭苏建教授出访贵州大学

2009 年 11 月 30 日到 12 月 2 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和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出访贵州大学，与该校广大师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交流，并做了三场精彩的学术讲座。现按时间顺序将本次出访的主要学术活动记述如下：

一、邓正来教授和郭苏建教授与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教授座谈



2009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8: 30 和 12 月 1 日晚 9: 45，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应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教授邀请进行了两次会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贵州大学“长江讲座学者”纳日碧力戈教授也出席了会谈。陈教授欢迎两位教授来到贵州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介绍了贵州大学社会科学基本的学术研究现状及规划，并从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与三位教授进行了探讨。

邓正来教授感谢了陈叔平校长的周到安排，并特别向陈教授介绍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办院宗旨和远近期规划，并提出针对贵大所处地理人文环境的特点高研院可以从四个方面帮助贵大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上打造符合自己特点的学术平台和团队。陈叔平校长完全赞同双方合作的想法与建议，并就有关合作细节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希望。

二、邓正来教授与贵州大学法学院师生进行座谈

2009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 00，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在贵州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围绕法学与学术传统问题、法学与学术批判问题、法学与问题意识问题、法学与具体学术层面研究问题给法学院广大师生做了精彩讲座。

邓教授称这四个问题都涉及“知识”的问题，是法学的思维问题。邓教授在报告中对四个问题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具有缜密的思维逻辑关系。指出法学不能没有学术传统，缺乏传统法学就只是一个消费主义、平面性的，没有根的。事实上，任何学问都如此。但对传统也不是一味的遵从，它不是标准，因此要具备批判的眼光和批判的精神，这样学问才有进展。问题意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学术传统脉络中把握；一是对现实结构的关注与分析，如此才出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

学问。就学术层面来说，从大处着眼，关心前提、过程和结论的整体观或评价是缺一不可的。邓教授正是从上述几个方面，探讨了学术意义上的法学思维性问题。邓教授报告结束后，在场师生踊跃提问。邓教授智慧而幽默地与提问的老师同学分享他对“问题”的看法。

三、邓正来、郭苏建、纳日碧力戈三位教授与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座谈

2009年11月30日下午2点，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与贵州大学文科学院教师座谈，就全球化与知识转型、绿色革命与新技术革命的世界影响、创新学术人才培养、教育和学术体制的弊端、人文学科学科建设、创新和发展等大家关心的问题交流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邓正来教授还具体介绍了复旦大学高研院一年来的工作和中长期目标，高研院如何以“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开展“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所取得的初步成效。还介绍了高研院的四大举措，即国际化的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学术讲堂、国际化的学术会议，以我们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以我们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研究走向世界，推动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

邓教授最后还提出了如何根据贵大所处的有利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后发优势突出重点发展“绿色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具体设想以及高研院如何与纳日碧力戈教授领导的贵大“长江学者”团队开展上述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合作。邓教授的创意受到人文学院领导和教员的热烈响应。

四、邓正来教授在贵州大学进行专题讲演



2009年11月30日晚7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在贵州大学北校区行政楼报告厅作了题为“全球化时代与知识转型”的专题讲演。贵州大学校领导陈叔平校长、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导和师生代表聆听了讲座，全场座无虚席，有许多学生都站着听完了讲座。

讲演由贵州大学陈叔平校长主持。陈校长首先借用竺可桢先生的一句话进行开场：“大学培养的不应只是谋食和谋技的人，更应该是谋道的人”并指出邓正来教授正是助大家谋道的学者。陈校长对邓教授基本情况进行介绍，随后代表学校向邓教授颁发“贵州大学特聘教授”的证书。

邓教授开篇点题，分别从“两个背景和三个使命”来重点阐述全球化时代与知识转型的问题。邓教授指出，中国1840年后才进入世界之中，但世界与世界结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是世界结构和游戏的局外人，不管对游戏规则是否满意，中国毫无发言权，我们的任何言语都毫无意义；入世后，中国进入世界游戏当中，中国为此也付出了昂贵代价，但却发现中国并不是游戏规则的掌控者，这不是主权国家平等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仍处于边缘，虽有发言资格和权利，但并不等于中国拥有真正的发言权力。邓教授疾呼：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



中国国家，却未曾对世界的发展做出何理论贡献，扪心自问：中国是否想过世界未来的理想途径是什么？

邓教授说，我们曾思想如何让中国挤进世界甚至赶超其它发达国家，我们思想一切，但却从不对思想进行思想，我们提出的中国之路不是西方化就是回复过去传统，我们丢失了对未来的想象力，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话语下，西方和西方化、现代化成了先进的代名词，成了我们追求的偶像甚至标准，曾几何时，西方化成了衡量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准绳，学科不再完整，西方化肢解了中国。

1978年改革开放来，中国在没有进行西方话语下的政治改革而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我们却未能向世界言说我们成功的道理，我们不能用理论把向世人讲述我们成功的故事，我们失语了……所有这些都给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使命：我们必须得担负这个使命，如此势必社会科学需要一个大革命，知识需要转型。

邓教授进而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障碍，唯西方化和唯学科化使中国的人文学科失去了自由、独立和完整，我们只关注我们缺少了什么，并试着用西方的东西来填补，却未曾关注我们拥有什么？“唯地方主义”的思想狭隘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缺乏世界眼光，缺乏与世界沟通交流的能力。

针对上面提及的知识转型所面临的障碍，邓教授提出了破解之法，首先要破西方化，寻找中国的东西；其次要破学科化，要跨学科去研究问题；再次要破地方主义，与时代共伍。

最后邓教授提出期望：我们正处于时代转型和知识转型的革命性分水岭，如何抓住这一时代机会，如何完成这三个使命是时代赋予社会科学和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的使命。

邓正来教授的讲座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其广阔的视野和思想的深邃在师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不时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讲座最后，长江学者纳日碧力戈总结，其简要精到、幽默生动的结语可谓是日上增辉，为讲座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讲座在严肃而不失活泼的氛围中成功结束。

五、邓正来、郭苏建、纳日碧力戈三位教授与贵州大学文科学院教师座谈



2009年12月1日上午9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与贵州大学文科各学院院长、书记及部分专家教授在贵州大学行政楼党办会议室进行座谈。贵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冯晓宪主持此次座谈会。

邓教授首先对于选择复旦大学建立高研院创办初衷进行说明，并对高研院基本情况和成立以来的学术活动详细介绍。

邓教授随后提出，全球化过程中带来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构，IT时代向ET时代转型。应意识到，世界能源技术和绿色革命在知识生产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目前尚缺少绿色革命意识，亦缺少对未来世界图景的勾画。在此背景下，贵州大学可抓住两点着重发展：贵州省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尚未遭受现代性破坏，可利用其后置优势，在学科发展中设立一个基地，跨学科



地进行绿色革命研究，二民族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研究重点上可转向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人如何看待自然，并以何种方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学校需要在学科发展上选择侧重点，抓住与世界的勾连，与未来世界秩序发生关联。邓教授针对高研院的创办经验，提出如下建议：

一、办一个严肃的学术刊物，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聚居情况具有别人不可取代的特色，应以民族学/人类学为龙头，体现贵州大学特色。

二、整合一支好的、综合性的团队，开展跨学科研究。

三、树立品牌意识，出版一套高质量的丛书。

四、围绕学校重点发展方向，创办一个高级的、真正的学术网站。

最后邓教授强调学术研究的三项原则：开放原则；重人才（学术）原则；学术平等原则。



郭苏建教授针对中西大学教育体制的不同，结合自身海外教研经历，对高校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讲演。一是通识课程的设置。西方高校普遍重视通识课程，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课程。二是哲学基础的强调，中国大学教育过于注重技术操作、收集资料能力，忽视哲学传统的影响。三是学术研究应具有理论高度，不能只停留在描述阶段。四是外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外语能力，对于学生阅读原著，进行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五是强调教员对于学校事务参与的重要性。六是注重大学教育的国际化，七要强调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最后郭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海外教学经验，认为西方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不仅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及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不断改革教员的教学方法，激励教员的教学热情，如设立年度教学奖，并将其作为考核依据。由于中国高校发展不平衡，贵州大学的教育体制、学科建设和学术环境相对落后，应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和学科规范化，减少教育体制的行政化。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对邓、郭两位教授讲演内容进行评论的基础上补充，提出学术研究的多样性问题。如贵州大学的喀斯特研究中心，强调技术性，注重技术物与物化的研究，在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层面，自然科学应与人文生态结合进行研究。国际生态学大师霍林注重人、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关系研究，并提出一个恢复力理论(resilience)。

纳日教授认为人的活动、人的主动性直接作用于自然，人的语言分类对环境亦有影响。语言中也存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语言方面、分类方面看出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这也是中国智慧的一部分。中国智慧也包括贵州智慧，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深度才可能推进。贵州的智慧也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为了与国际学术接轨，大家应共建一个合作平台，多学科整合，共同开展多样性研究。



参与座谈会各文科学院领导针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人文学科发展、学术团队的构建、高校教育体制与管理运行机制等问题与三位教授进行探讨和交流，现场互动频繁且热烈。

六、郭苏建教授在贵州大学进行讲演

2009年12月1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在贵州大学行政楼报告厅发表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思考”的讲演。此次讲演由贵州大学校党委副书记任钢建主持。



任副书记首先对郭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并代表学校为郭教授颁发“贵州大学特聘教授”的荣誉证书。

郭教授的讲演围绕四个层面展开:一、问题的提出;二、什么是“中国模式”;三、中国经验或模式的国际影响力问题;四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模式应有什么调整和发展?

郭教授首先围绕五个要素从理论上界定不同的经济体制,并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对立的经济模式进行比较。郭教授提出现实生活中存在四种经济体制模式:以苏联、朝鲜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以美国、中国香港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在对市场社会主进行概念剖析的基础上,郭教授重点阐释中国特色市场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上的特点及其新发展,并例举国外的种种评论说明。

郭教授认为在中国的经验或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问题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时间还短,我们的经济和经济体制还处于“转型”过程,具有过度性、不确定性、中间性、阶段性和发展中的一些特性;二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虽有进步,但还处于渐进性的不断改革和完善过程中,我们正在实现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转型;三是我们的价值体系、文化体制、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和重构过程还远未完成和定型;四是我们建设一个公正、平等、和谐社会方面还任重道远;五是中国的国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国际经济结构变迁、新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的重构。

最后郭教授总结,关于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模式的调整和发展问题,一、这涉及到经济哲学层面上的理论思考。具体而言,涉及到我们对“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国家主义”的基本评判;二、市场被历史证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机制,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是有效的。但是,市场也有它的局限性。过分迷信市场的作用,也是不恰当的;三、若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崇尚经济国家主义,则是一种误导。价值规律和竞争原则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不应一味地排斥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划分“西方的”和“东方的”;四、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最大启示就是:市场和国家有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五、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投入和运作及各资本要素是私人控制的,为了私人的资本和财富积累。我们国家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银行,不可私有化。但是,这不应影响我们经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经济市场化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要进一步学习西方银行和金融业先进管理和资本运作经验,要对国家关键产业进行重新界定,对非国家关键产业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

讲演结束后,纳日碧力戈教授进行总结和评论。在座的三百余名师生认真听取了郭教授的精彩讲演。部分师生踊跃进行提问,郭教授一一进行耐心细致地解答。讲演在热烈的互动气氛中结束。

六. 年会报道

1.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2月19日-20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复宣酒店四楼报告厅举办了“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高研院学术顾问、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上海社联党组书记潘世伟,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庆,日本神户大学副校长中村千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他对高研院创立“未来世界论坛”以及举办此次“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背景进行了介绍,并代表高研院对诸位同道一年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他说道:“过去的一年,复旦高研院在学术研究成果、高水平学术团队和学术活动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深知,没有诸位同道的大力支持,复旦高研院能取得目前的一点点成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邓教授指出,在高研院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以学术研讨的方式举行“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既是符合我们“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根本学术理念的最好纪念方式,也充分体现了我们“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以及用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来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设想。

高研院学术顾问、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在致辞中指出,备受全球关注的哥本哈根会议刚刚落下帷幕,我们的“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讨论会拉开了序幕,这说明全世界都在关注关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话题,所以本次大会的召开恰逢其时,意义深远。秦先生指出,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类用化石能源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也产生了大量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全球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解决这些难题,既需要政府和企业承担起相应责任,更需要学术界的智慧和远见。在我们的大学和社会里面,人文社会科学应瞄准世界和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国家政策、法律的出台,为外交谈判的开展,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而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深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提高国际对话能力,让中国学术、中国思想走向世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的世界贡献力量。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上海社联党组书记潘世伟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学术界、社会科学界向复旦高研院和此次学术大会表示真诚的祝贺。就高研院而言,一年多来,它举办的学术活动在内容的丰富性、形式多样性、层次高端性等方面,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它在贯彻一种理念,亦即使中国社会科学如何既做到国际化又坚持本土化。所谓国际化,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上海社联党组书记潘世伟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学术界、社会科学界向复旦高研院和此次学术大会表示真诚的祝贺。就高研院而言,一年多来,它举办的学术活动在内容的丰富性、形式多样性、层次高端性等方面,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它在贯彻一种理念,亦即使中国社会科学如何既做到国际化又坚持本土化。所谓国际化,

就是要使我们的社会科学及其研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努力形成良好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并从中国国情出发，把中国的学术看作是中国特定国情条件下的一个精神生产活动。我们在努力借鉴国际有益要素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基本理念、话语体系和分析工具。在这方面，复旦高研院做了初步的但非常可贵的尝试。就此次研讨会而言，生态环境问题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焦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当代中国所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上，我们应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农业社会，虽然在局部上使一些生态要素得到过度使用，但从整体上讲，其生态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迅猛发展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使我们的生态系统受到了不应有的波动。这种波动已经引起了我们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怎么样在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尽快富裕的同时，保持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这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注意倾听来自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此次大会一定会在这些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庆在致辞中强调当前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正推动一场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一道，正在积极投身到这场变革的大潮之中。这次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全球资源的可持续性真实地摆到了世界各国政府面前。人类发展和进步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对资源无限制的挥霍，使我们生存其间的环境无法承受，还是进行一场绿色革命，开辟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的新路。此次复旦高研院举办“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恰逢适宜。对当今的中国来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最后，王先生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和环境委员会和全国环境科学学会，向“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日本神户大学副校长中村千春代表国际学者致辞。他指出，从全球来看，科学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但同时全球变暖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涌现了出来，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处理这些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引起的各种问题。如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解决污染气体带来的复杂社会问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间，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间协商与合作，共同制定切实可行、公正合理的具体操作方案。坦白地说，一方面，我们发现还需要大力发展战略高科技以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难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国际社会上，所有的利益与矛盾都凝结在了一起，远远超出技术本身的范围，这需要拥有共同志向的人们聚在一起通过协商讨论来解决问题。他认为，上述这些想法是符合“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办会宗旨的，并且相信此次学术研讨会将使得我们对当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

本次学术研讨会设有基调发言和专题讨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庆和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兼高等研究院院长戈文丹·帕拉伊尔 (Govindan Parayil) 分别作了题为《绿

色革命与技术创新》、《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角理解绿色革命及其影响》的基本调发言。

本次会议共有五场专题讨论，主题分别为绿色革命与可持续发展、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绿色发展及中国应对战略、全球气候变化与国际对话、绿色发展新范式与生态文明等。

来自中外十多个著名大学的教授和专家出席了会议。朱维铮、Govindan Parayil、桑玉成、张小劲、大西广、吴季松、郑晓瑛、蔡拓、王宁、林尚立、张曙光、黄仁伟、沈丁立、余潇枫、王柯、任晓、顾肃、张乃根、任远、童世骏、Barbara Göbel、沈国明、吴炫、蔡守秋、王曦、潘天舒、陶澍、王毅、戴星翼、胡志德、王焱、Sunjoy Joshi、Samir Saran、彭希哲、时殷弘、黄晓明、萧思健、朱学勤、郑也夫、何增科、诸大建、王岳川、王铭铭等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先后在各个学术讨论专题中做了精彩的发言。杨志刚、汪晖、张曙光、戴彦德、赵义怀、方流芳、刘丽华、刘爱华、许纪霖、沈志华、李维森、陈明明、Gustaaf、张乐天、贺圣遂、黄玉峰、马忠法、郑晔、郭苏建、纳日碧力戈、刘清平、吴冠军、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邓正来等三十多位学者以论文或提问的方式参与了会议研讨。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担任本次会议的同声翻译。

来自新华社、中国新闻网、解放日报、新民网、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东方早报和上海广播电台的媒体记者也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次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绿色革命相关的一系列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讨论激烈，颇有成效。研讨会于 20 日中午圆满结束。

学术研讨会开始之前，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就本次会议的主题以及高研院的学术发展思路进行了座谈。



高研院全体成员与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会后合影
(左起：张东平、黄倩、沈映涵、吴冠军、林曦、郭苏建、杨志刚、邓正来、
纳日碧力戈、王珂、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陈晔)

2.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

2009年12月20日上午11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复宣酒店四楼报告厅举办了高研院成立一周年纪念暨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嘉宾有:神户大学副校长中村千春(Nakamura Chiharu)、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兼高研院院长戈文丹·帕拉伊尔(Govindan Parayil)、德国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主任芭芭拉·格贝尔(Barbara Göbel)、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斯塔夫·杰拉茨(Gustaaf Geeraerts)、新西兰国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主任胡志德(Theodore D. Huters)、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纪霖,以及当代中心首批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晖、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教授王珂、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浙江工商大学文艺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明明、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等。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主持了纪念大会和当代中心成立大会。

高研院学术顾问、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因临时安排未能莅临现场,但他特别委托杨志刚教授宣读了他的贺词。秦书记在贺信中代表复旦大学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学者,希望当代中心能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搭建起交流、沟通和对话的平台,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涌现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接着,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和当代中心致辞。邓教授指出,在高研院成立一周年之际,高研院能够成立附设于高研院但以复旦大学的名义运作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不仅充分说明了我们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更说明了诸位领导和同道、特别是复旦大学领导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他强调,社会科学的文化依存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地方性,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我们只能“用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促成国际化的影响”,亦即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绝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谈及未来规划和学术理想,邓教授指出,当代中心将秉承“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确立“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坚持走“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路径,努力以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理论探究走向世界,



以基于中国立场和视角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同时推动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

在热烈的掌声中,复旦高研院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朱维铮先生和邓正来教授共同为当代中心揭牌。

朱维铮教授和邓正来教授为 Barbara Göbel, Govindan Parayil, Gustaaf Geeraerts, Theodore D.



Hunters, 黄晓明等五位教授颁发了当代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聘书。

朱维铮教授和邓正来教授还为当代中心副主任王柯、王铭铭以及汪晖、时殷弘、沈志华、吴炫、陈明明、韦森、张乐天和任远等到会的首批特聘研究员颁发了聘书。

日本神户大学副校长中村千春 (Nakamura Chiharu) 教授在致辞中希望当代中心能为世界提供对当今中国最新的实质的深度认识。他认为,人们需要变化并且当下世界、特别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正在变化之中。所有这些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面对未来,我们应当保留和改变什么。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除非大多数人都同意,否则很难形成有效力的共识。他希望当代中心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对这一大多数人都关心的复杂问题形成更为深刻的认知。Nakamura Chiharu 教授指出,针对诸如绿色革命和全球秩序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不仅需要各学科内部的深入研究,更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其中进行理解问题的思路的创新这一工作尤为关键。



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兼高等研究院院长戈文丹·帕拉伊尔 (Govindan Parayil) 教授则表示非常荣幸能成为当代中心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指出,联合国大学及其高研院旨在推广“以科技推动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希望通过与复旦大学的广泛合作,在此基础上针对大家都关心的理论问题,拓展交流领域,丰富交流内容。他相信,当代中心旨在运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来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学术对话,期待双方相互沟通和交流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德国伊利比亚美洲研究所主任巴巴拉·格贝尔 (Barbara Göbel) 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对全球化趋势的考察和对全球化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各个地方的具体社会、文化、政治的背景性考察,其所从事的拉丁美洲研究旨在通过个案的研究揭示出某种趋势和变化的可能性。她希望通过与当代中心从事的中国问题研究形成比较、交流和互动。巴巴拉·格贝尔教授希望以后与复旦高研院和当代中心的合作交流以一种跨区域研究的、以问题导向为重点的学术方式进行。





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斯塔夫·杰拉茨 (Gustaaf Geeraerts) 教授指出，伴随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更为重要的力量，更加需要对其独特的发展道路进行分析与研究。基于中国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且也正在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身份和定位，例如中国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这是一项涉及极广的综合性复杂工程。所有这些都值得中外中国研究学界认真研究。他特别希望能和高研院、当代中心开展进一步的合作研究。

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明教授在致辞中描述了当代中心将要面临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其中包括如何通过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概念体系解释、分析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等问题。黄教授回顾了他十多年来与邓正来教授探讨学问的经历，希望当代中心能在邓正来教授的领导下关注中国乃至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深入挖掘问题的实质，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主任胡志德教授宣读了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亚洲研究所主任王国斌教授的贺信。在贺信中，王教授说他相信“中国学术界此一盛举，应能为未来国际学术界提供重要贡献，也将为整合中国的学术力量，融入国际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他同样也希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能够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密切合作，推动研究生培训工作的开展以及学术研究的繁荣。”

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教授发来了贺信。童教授在贺信中指出：“无论是因为当代中国的重要，还是因为当代中国的复杂，当代中国的优秀学者都必须齐心协力，携手合作，在同一个研究中心之中，在不同的研究机构之间，使当代中国人更加无愧于古代中国的祖先，也更加有功于未来中国的后代。”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纪霖教授指出：复旦高研院在整个一年中的学术成绩有目共睹，它在全球视野的大背景下，开展了系列性学术活动，请来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来高研院交流，同时又不是单纯地跟随国际潮流，而是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和中国关怀。许教授希望复旦高研院和当代中心以后能够比翼双飞，继续给复旦、上海乃至中国学术带来新气象和新面貌。



据悉，当代中心附设于高研院但以“复旦大学”的名义运作。该中心将以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各个相关院系为平台，以“国际化”、“跨学科”为特色，以“重新发现中国”和“推

进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研究”为学术理念，以高研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国外著名中国研究学术机构为核心，以其他国际著名中国研究机构为网络，努力建成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国际平台和国际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沟通、协调与合作平台。

附 1：贺信与致辞

秦绍德书记发给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贺信 贺 信

值此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之际，我代表学校致以热烈地祝贺，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表示诚挚地欢迎。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广泛的素材，也为把中华文化播扬到世界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希望中心能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搭建起交流、对话的平台，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涌现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秦绍德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廿十日

邓正来主任在当代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根据中国、走向世界 ——在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邓正来（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尊敬的诸位同道：

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欢迎诸位参加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暨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在高研院成立一周年之际，高研院能够成立附设于高研院但以复旦大学的名义运作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不仅充分说明了我们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更说明了诸位领导和同道、特别是复旦大学领导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必须对诸位领导和同道、特别是复旦大学领导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同时，我也要对我们的主要合作伙伴 UCLA 亚洲研究所、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及其主事者王国斌先生、古斯塔夫·杰拉茨（Gustaaf Geeraerts）先生和黄晓明先生致以最衷心的谢意！

我们知道，随着冷战意识形态的终结、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等的降临，主要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型构的当下世界秩序正处于亟需调整的重要“时刻”。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

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我所谓的“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同时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就此而言，我想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的文化依存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地方性，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我们只能“用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促成国际化的影响”，亦即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绝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本身、特别是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理论探究。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当下中国”，不仅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当下，更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关心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学者探究但却一直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学术富矿”！

我们知道，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不仅取得了长达31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而且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的今年，我们仍然可以以超过8%的增长率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这31年的发展实践已同时成功地摆脱了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主流的发展模式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中国奇迹”或“中国成功故事”，而所有这些都不能依靠西方既有的理论模式予以解释，唯有中国社会科学通过自己的概念体系、分析框架等才能予以解释。在古典传统、计划经济传统和部分西方化传统融合的当下中国，究竟是何种因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绝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我们采用跨学科视角、运用中西多种理论资源予以深刻认识的理论问题。

当然，当下中国绝不仅仅是地理的中国，更是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一个具有自身传统的历史性中国。在世界秩序和世界结构面临重组的历史时刻，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更要关注世界，更要关注当下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而要关注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性，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社会科学知识在世界秩序重构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我经由长期研究后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实是一种以权力和“正当性赋予”为基本实质的话语。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到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只要我们洞见到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并恢复其批判性品格，我们同样能够以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为灵感之源、以基于中国视角对“世界理想图景”的想象为理论依据而建构我们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而推动这种理论走向世界。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创设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依据。我们将秉承“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确立“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坚持“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路径，努力以我们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理论探究走向世界，以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和视角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同时推动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

谢谢大家！

中村千春教授的贺信 Congratulatory Remark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NAKAMURA Chiharu, Vice President of Kobe University.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t is indeed my great pleasure and honor to be here to say a few words at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Fudan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Before coming to China,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read the Mission Statement of the Fudan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I understand that this will be a unique research center dedicated to developing new researches on China for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t is my understanding that this Center will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ereby bringing about a deeper appreci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orld is changing rapidly. Border that once existed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and cultures are disappearing. China, especially the city of Shanghai has made a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st decade.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Shanghai after my first visit in 1993. I notice that there are many fast food restaurants, famous coffee shops and convenience stores in your city. Many of these are the same ones that I see in Japan. These international chain stores ensure customers the same quality of food or beverage no matter where they might be.

The popularity of Internet has also made it easy for us to purchase most anything we want from almost any where in the world. The benefit is of course people can enjoy the same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se benefits might also take away our identity, which makes us unique. At a time of great chang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our values. What to keep and what to change is a difficult process. In this sense,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es that will be carried out at the new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In closing, I would like to once again congratulate everyone who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udan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NAKAMURA Chiharu
Vice President of Kobe University

Barbara Göbel 教授的致辞

Distinguished chancellor,
Distinguished dean,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a great honour for me to have been invited to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at Fudan University. This is a great day for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Center, at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is timely and challenging. It corresponds to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deep regional knowledge in order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phenomena. Global phenomena cannot be grasped without taking their interrelations with regional and local developments into account, they cannot be explained without considering cultural, soci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I am myself the director of an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 the Ibero-American Institute in Berlin, focusing on Latin American, the Caribbean, and the Iberian Peninsula. The Ibero-American Institute has three pillars: It is a research center, it hosts the largest library in Europe on Latin America and it works as a cultural center. This is why I am very much aware of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area studies and the scientific challenges of the increasing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world we jointly have to face.

Transregional area stud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meaning not only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but also the analysis of the entanglement of these regions. For example, Latin America and China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rwoven. Many developments in Brazil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taking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to account. 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nalyze more profound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Europa and Latin America.

Therefore I congratulate the authoritie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I wish the center all the best and look forward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Dr. Barbara Göbel, Director, Ibero-American Institute, P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 Foundation, Berlin (Germany)

古斯塔夫·杰拉茨教授的致辞
Congratulatory remark by Gustaaf Geeraerts
Director BICCS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have been given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the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and its Distinguished Dean, Professor Deng Zhenglai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Fudan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which we are inaugurating today,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timely move ahead indeed.

As China becomes ever more important in the world there is a genuine need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ts unique path of development. China has a strong identity, which is most distinctive in terms of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economy, political system and path of development. When a country with such long-standing and rich culture reemerges one cannot expect it to adapt simply and easily to the ways and rules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chang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capabilities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changing the distribution of identities.

For many westerners this is very difficult to grasp, as they tend to project their own identity on China as the newcomer who is thriving within the existing system they established and protected so carefully over the years. Little do they know about the many profound changes that China has gone through since the liberation in 1949. Neither do they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ny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at saw the light in China since then. Even less do they know about the tremendous challenges that China is facing on its road to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 have put forward as the ultimate societal goal. Not surprisingly, they are ill

prepared to live in a world in which China is reassuming a greater role and simultaneously is remolding that very world with certai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udan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is poised to play an historical role. Its research and programs will provide the much-needed knowledge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unique process of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its emerging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make people outside China familiar with China's exceptional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at make for its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 new center is organized to do so not through preaching but through dialogue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more conventional ideas and methods in mainstream social science, thereby demonstrating all the more clearly China'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budding global scholarship in social science.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am more than happy to announce on this very day the conclusion of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Brussels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BICCS) to set up a joint mast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his joint master program will aim at providing outstanding education to students from Europe. After a profound introduction of one semester at BICCS, located in the capital of Europe, students will move to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for complet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master program. Upon completion of all requirements,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a double degree.

The joint master program will provide cutting-edge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o Europe's decision makers and opinion leaders of tomorrow. It will combine in-depth academic learning with intensive interaction with policy-makers, diplomats, civil servants and other practitioners.

A major added value of the project lies in the lowering of the threshold for European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Already in Europe they will be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receive practical preparation for their study in China.

Needless to say that this common Sino-European endeavor fits nicely with the new center's mission and is only a first step in what I hope to become an ever more int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In conclusion, allow me Professor Deng Zhenglai to congratulate you most sincerely once again with this timely initiative which is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黃曉明教授的致辭
Speech at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Fudan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19 December 2009

Professor Xiaoming Huang, Director, 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re

Today, we gather here to mark a special event in the world community of China Studies – the opening of the Fudan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It is not accidental that such a significant institution is established here at Fudan University. There are presumably hundreds of research centres and institutes for China studies at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Over the years, these centres and institut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our views and thinking about China, as well as approaches

to China study. We all remember, for example, the Fairbank Cent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when we were college students ourselves. Thanks to Professor Fairbank's influential work, we've got used to think China's modern development as shaped in a pattern of stimulus-reaction with the West. For another example, many of us are familiar with the works of what I call the Michigan school of China studies – Michel Oksenberg, Kenneth Lieberthal and Harry Harding who explained to us how the party-state bureaucracy determined things in China. We have long noticed that a majority of good scholarly works came from non-Chinese academic institutions outside China. We can debate whether non-Chinese scholars or scholars in a non-Chinese academic environment can produce better observations and analyses of China. But if our research centres and institutes in China cannot produce or attract best China scholars,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not right. Toda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udan China Centre clearly has this in mind – to attract and produce best China scholars in the world. Fudan University is best positioned to support such a centre.

China studies in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like Asian studies in general, also witnessed an overwhelming dominance in the past of scholars and interests in humanities: history, religion, arts, music, etc. As those who later became dominant figures in China studies were trained in these disciplines, their interests and focuses dominated research and teaching about China at universities. Thi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adequate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today. We want to know Chinese history of the past five thousand years, but we also want to know how the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works, how its politics operates, how its society is organized, and how law in China is made and what role it performs in society. Learning and explaining thes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cholarly challenge not only because China today is different from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hundred years ago, or just 30 years ago. Anyone can tell you how different the country would be if he is away for 5 years. But it is also because what these constant changes post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to the world of China knowledge in particular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general. Institutionalists argue, for example,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the preferred institutions. China's growth experience therefore seems to be a big puzzle to them. Friedrich Hayek, for another example, proposes that a spontaneous social order fits best with modern development. But what does this precisely mean for China? Does it mean we shall impose a liberal order or we shall be happy with whatever turns out to be, or some combination of both? So on and so forth. These are large debates in social sciences. A focus on contemporary China therefore can not only add value to China knowledge, but more significantly advance our knowledge and capacity in social sciences. There is no better way to achieve this than having a research centre established with expanding knowledg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 its mission in a university with its leading expertise, best resource support and best international networks o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his is the same vision we envisaged for ourselves when we established the 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re.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Fudan China Centr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debate, discussion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Fudan China Centre will be led by no better scholar and institutional builder than Professor DENG Zhenlai. I have known Professor Deng personally for about 15 years. I still remember his vision of Chinese scholarship in social sciences on the

world stage 15 years ago when Professor Deng was working on his civil society project and his campaign to promote academic standards and ethics in Chinese academia. Then as well as now, Professor Deng's vision is not only to promote China studies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advance the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in the world scholarly community. Professor Deng has achieved a great deal over the past 15 years. With the Fudan China Centre as a new platform, I am confident that China studies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will hav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dvance. The 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re congratul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udan China Centre and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Fudan China Centre to advance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王国斌教授的贺辞 贺辞

欣闻复旦大学及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我谨借此机会表示诚挚的祝贺。中国学术界此一盛举，应能为未来国际学术界提供重要贡献；也为整合中国的学术力量，融入国际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国内外的相关学者与高水平的研究生，将能在此基础上构成有效的研究网络。我也衷心期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州研究所，能够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密切合作，推动研究生培训工作的开展以及学术研究的繁荣。通过对社会演化及其在国际地位的变迁提出新的解释，相信不但可以展现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更能提升当代中国研究的国际水准。

王国斌

童世骏教授的贺辞

尊敬的邓正来主任：

欣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我谨代表上海社科院的同仁，表示衷心的祝贺和祝愿！

贵中心的成立恰逢其时。经过六十年新中国建设、三十年改革开放，历来把“中国”与“古老”放在一起谈论的国外舆论和学界，对当代中国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代中国研究”成了诸多深度报道和专业著述的热门话题。但无论是作为研究的主体还是作为研究的对象，当代中国学者更应该承担起当代中国研究的使命。外国人有的把中国当作一个“问题”甚至“威胁”，有的把中国当作一种“范式”甚至“榜样”，这些观点可以给我们启发，但不宜被我们当作结论。对当代中国学人来说，当代中国不是别的，它首先是我们的责任。

给当代中国留下了最深刻的个人印记的一位伟人曾经说过，“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对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对我们的自我认识，也是一个严峻挑战。认识中国意味着“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这两者虽可以适当区分，但终究是相互依赖的：“理解”的基础是“了解”，而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也离不开“理解”。“理解”中国不仅要描述中国（知其必然），而且要解释中国（知其所以然）和评价中国（知其所当然）。对中国做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中国人有独特优势，但也需要格外小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祖

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观察，但也切不可没有客观的观察。对中国的国情，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无论是因为当代中国的重要，还是因为当代中国的复杂，当代中国的优秀学者都必须齐心协力，携手合作，在同一个研究中心之中，在不同的研究机构之间，使当代中国人更加无愧于古代中国的祖先，也更加有功于未来中国的后代。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哲学所所长
童世骏
2009年12月17日

许纪霖教授的致辞

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一周年、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的大喜日子，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来祝贺。我们作为同城的同行，旁观者清，复旦高研院在邓正来教授的领导下，给上海学术界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可以说是给复旦和上海的学术界都带来了新气象。复旦高研院在整个一年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许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八个字：“世界视野，中国意识”。复旦高研院在国际视野的大背景下，开展了系列性学术活动，请来了一批国家知名学者到高研院交流，同时又不是单纯地跟随纯国际潮流走，而是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和中国关怀，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问题。

这几年国内不少著名高校都成立了高研院，复旦高研院在国际化和跨学科这两点上来推动中国的研究，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刚才我在下面与邓正来教授私下交流，我们对什么是一流大学有一个共识，即不仅有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学术氛围。这个一流的学术氛围不仅在某个专业和学科，而是在跨学科的全校氛围，能够打破原来专业的界线，在跨学科的背景下进行高层次的交流。复旦高研院虽然刚满周岁，在给复旦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不仅给复旦，也给上海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气象。

上海的学术界，从全国来说排名老二，除了北京就是上海。但是说实话这几年的状况是“大上海，小学术”。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奥巴马访问上海，核心节目是与上海的大学生对话，上海几个大学的大学生提了7个问题，事后国内外媒体的评论普遍表示失望，几乎没有什问题是真正有分量的，对奥巴马可以构成智力挑战的。前两天我看到国内一家杂志的专题深度报道，披露了一个内幕，说是当时在现场的一位上海主要领导人很感慨地说：“哎呀，上海的孩子呀，与北方的孩子比起来，就是太软。”什么叫太软？为什么会软？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来思考。我觉得上海的学生与北京的学生相比，缺乏一点雄风，缺乏一点大气势、大视野和大思路。这个问题不仅复旦有，华东师大有，其它的高校也有。软的问题怎么解决，靠上海本身是解决不了的。最重要的是要引进和开放，要有来自全国，全世界不同流派的“硬”的学者汇聚上海，然后才能真正改变上海，形成在学术上的大上海。

从这点而言，邓正来教授可以说是“南下干部”，这几年在上海学术界还有一批这样的“南下干部”。先南征，后北伐，这大概就是上海学术界重振雄风的道路。如此我们才能形成大思路，大视野，形成有个性、有品质的研究。

在庆祝复旦高研院成立周年的今天，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也诞生了。这似乎又多了一个翅膀，我希望复旦高研院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后能够比翼双飞，继续给复旦和上海乃至全国带来新气象和新面貌。我期盼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们能够重新聚在这里，庆祝上海和中国学术的盛世。

许纪霖

附2：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组织结构

主任：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

副主任：

王铭铭（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王柯（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教授）

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共5位，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Barbara Göbel, Director of Ibero-American Institute (IAI), Germany

Govindan Parayil, Director of UNU-IAS and Vice Rector of UNU

Gustaaf Geeraerts, Director of 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heodore D. Huters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UCLA)

Xiaoming Huang, Director of 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re

特聘研究员（共24位，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

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胡必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世界中国学论坛秘书长）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

李维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林尚立（高研院双聘教授、国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政治学系教授）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任远（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社会学教授）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汪晖（清华大学教授）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吴炫（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西湖学者）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社会学教授）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

3.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组织结构形成

主任
邓正来



邓正来，1956年2月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1998—1999年受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3—2008年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受聘吉林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2007年资深访问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兼职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和《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等。

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20余部；主要编著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国家与市民社会》（与亚历山大联合主编）等30余部；主要译著有《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主译）、《法理学》和《政治学说史》等近20部。

副主任
王铭铭



王铭铭，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双聘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兼副主任，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福建泉州人，1962年3月14日生。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导。1987年10月—1993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1985年9月—1987年6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1981年9月—1985年6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本科生。

从研究生期间开始译介西方人类学理论，博士论文期间专门研究城市仪式、时间—空间象征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博士后期间转向乡村研究与理论研究，曾在闽台三村、一市中从事长期田野调查，撰述大量中文论著，致力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区域研究、宗教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有研究专长。目前除继续既有研究脉络外，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异文化叙述及海外民族志及文化展示研究。现已发表中文学术专著18部，英文专著1部，译著3部，主编论文集7部，及大量中外文核心期刊论文。

副主任
王柯



王柯，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个人著书：

2007年 《走向“天下”》（插图本），日本农山文化协会，206页
2007年 《民族与国家》（韩文，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翻译丛书 6, 417页，ISBN 978-89-6187-011-5-93910）
2006年 《二〇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設与民族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336页
2005年 《多民族国家 中国》岩波书店、248页
2001年 《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88页
1995年 《“东突共和国”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315页（获日本第十八届三得利学术奖）

主任助理

林曦



林曦（1982-），福建仙游人，获伦敦经济学院法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兼伦敦经济学院中国比较研究网客座研究员。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任教，并受邀在剑桥、牛津、哈佛、布里斯托、北安普敦、诺丁汉等高校讲学。曾在英国谢菲尔德市政府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伦敦总部）任职。主要研究兴趣为法学理论、比较政治学和人类学。

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Barbara Göbel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Director of Ibero-American Institute (IAI), Germany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h.D. Soci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Germany, 1990 (Minor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2002 - Present Executive Director, IHDP, Bonn (Germany)

1993 - 2002 Lecturer and Researcher,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

1996 - 2001 Interdisciplinary DFG Priority Programme: "Me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Three years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NW Argentina, N Chile and S Bolivia

1998 - 1999 Research Fellow,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France)

1995 - 2003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ies of Buenos Aires, Córdoba, Jujuy (Argentina), La Paz (Bolivia), Católica del Norte and Tarapacá (Chile)

1993 - 2003 Consultant of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indigenous organisations

1990 - 2003 Lecturer, Universities of Göttingen, Tübingen, and Hohenheim (Germany)

Field of Study

Human-Environmental Relations,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tercultural Risk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Interdisciplinarity

Govindan Parayil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Vice-Recto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

Directo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UNU-IAS)

Professor Parayil is Vice Recto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 and Director of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UNU-IAS). Professor Parayil came to the UNU from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Oslo where he held a Professorial chair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Before that he was with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s a faculty member in the Faculty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and served as Head of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Programme (2001-2004). He also served (1994-2001) on the faculty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previous academic affiliations include Cornell University,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 State University. Parayil holds a Ph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from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 State University, a M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Values from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a MA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from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a B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cut, India. He has published four books, numerous book chapters and over thirty article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He is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serves on the Advisory Board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

Gustaaf Geeraerts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Director of 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Gustaaf Geeraerts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BICCS), both at the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VUB). He is also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Globa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2006 to 2008 he was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 Solvay Business

School of VUB. Since 1999 Professor Gustaaf Geeraerts holds a Guest Professorship in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From 1999 until 2004 he was an Honorar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 In the period 1986 to 1990 he was located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Utrecht where he was specialized in research on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rocesses. During that period he was also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Lecturers of the Centr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the Netherlands (CARIAN).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entr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hina's foreign policy, global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mong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are: (with Men J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 in Global Society, (Vol.15, 2001); (with Men Jing) "China's Rise and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in Studia Diplomatica, Vol. 56, (2003), No. 6; (with Eric Remacle and Natalie Pauwels), Dimensions of Peace and Security, Brussels, Peter Lang, (2006), (with Jonathan Holslag), Macht of Mythe? Achter de schermen van het Chinese groeimirakel. (Power or myth? Behind the scenes of China's growth miracle), Brussels, VUB Press, 2006, and (with Chen Zhimin & Gjovalin Macaj) "The Reform of the UN", in Crossick, Stanley & Etienne Reuters(eds.), China-EU: A Common Futur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7. In 2003 he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his Chinese colleague of Fudan University, Chen Zhimin, Ouzhou lianmeng duiwai zhengce yitihua: bukeneng de shiming? (Foreign Policy 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Mission Impossible?), Beijing, Shishi Publishing House, 2003, for which they received a Shanghai Research Reward in 2004.

胡志德 (Theodore D. Huters)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UC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胡志德，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副系主任，上海大学客座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特派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美国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专家。1969年1月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72、1977年，获得斯坦福大学中文硕士、中文博士学位。曾任加州大学北京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有：《钱锺书》（波士顿：G.K. Hall 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年）、《把世界带回家：西学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翻译过北岛、汪晖等人的著作。

黄晓明



黄晓明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教授、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新西兰国籍，祖籍江苏苏州，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2004-2006年，曾经担任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系主任。在黄晓明教授努力下，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先后与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中国八所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建立起稳定的学术交流机制，并促成了新西兰首个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

特聘研究员

秦晖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后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对农民、农业与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广义农民学(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及其演进、改革与现代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目前研究的重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业、土地、农民问题，前工业社会的不同模式，农民社会现代化的不同模式。

作为历史学者，秦晖的研究历程始于1978年，当年他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方向是“土地制度与农民战争史”，关注的时代则在明清。此后二十多年来他的视野不断拓展，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

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关中、云南等)、改革革
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
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曾获:中国高校教师霍英东奖(1991年)、陕西省
社会科学成果奖(1990年)、五次获陕西师大科研成果综合奖(1987年、1988年、
1991年、1993年、1994年)、陕西师大青年优秀论文奖(1989年)等。

秦晖曾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有:中国经济史、古典
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农民学、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
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中国古代史(秦汉史)等。目前
在清华大学开设有全校通选课《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系本科专业课《秦
汉史》等。

赵汀阳



赵汀阳,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中文论文:

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2005/3

预付人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4(《中国社会学文摘》转载 2006/4)

儒家政治的伦理学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4

民主的最小伤害原则和最大兼容原则,《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3

救灾与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4 民主的最
小伤害原则和最大兼容原则,《哲学研究》2008-6

从国家、国际到世界:三种政治问题的变化,《哲学研究》,2009-1

共存存在论:人际与心际,《哲学研究》,2009-8

预付人权理论,《人权》,2008, 2

精神政治的四大发明,《社会科学论坛》,2008-7。

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0

普遍价值和必要价值,《世界哲学》,2009-6

等等。

主要外文论文:

1. Pour un Syntext, ALLIAGE, No. 41-42, France.2000. 法国,
2. The Times of Reculturing, ALLIAGE, No. 45-46.France.2001. 法国,
3. Reciprocidad Alteralidad, In En el Camino: Cultura y Patrimonio, ed.De Rote, Espania, 2002. 西班牙,
4.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In les Assises de la connaissance reciproque, ed. Alain Le Pichon, France, 2003。法国,
5. Is it possible if a new encyclopedia is needed? In les Assises de la connaissance reciproque, France, 2003。法国,
6. 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 Social Identities, Vol.12, Jan.2006. UK. 英国

等等。
孙立平



孙立平，1955年出生。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特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并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合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辑。另外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则关注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型过程。

沈志华



沈志华，1950年出生，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

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

著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等作品。

黄仁伟



黄仁伟，1954年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经历：参与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研究（1992-1993年）、21世纪上海发展战略研究（1994-1995年）、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战略研究（2003-2004年）、上海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2004-2005年）；中央台办有关课题研究（2004-2005年）；中央党校“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研究（2003-2005年）；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美战略对话（1997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日三边战略对话（1998年---）；中台办中美台湾问题高层对话（2000年---）；以及其他重大研究项目和重要战略对话。

出版著作：《罗斯福政言录》（1989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美国同事（第三卷）》（1991年人民出版社）；《美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1992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2002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国家主权新论》（2004年时事出版社）；《中国国际地位报告》（2004-09年人民出版社）；《经济发展前沿问题》（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他大量论文、文章及研究报告。

汪晖



汪晖，现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扬州人，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

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7年卸任），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袁志刚



袁志刚，男，1958年1月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英国杜伦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中国劳动保障》杂志专家委员会委员，《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编委，“985二期”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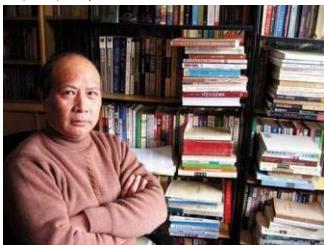
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赴法国留学，1993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3年6月回国，留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工作至今，曾多次赴法国等欧洲国家短期工作和讲学，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进修一年。

袁志刚多年来一直从事宏观经济学和非均衡经济学的研究，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攻读博士期间，师从国际著名非均衡经济学家贝纳西教授，力图把非均衡这一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经济分析中。1993年6月回国后承担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的课题，继续从事上述研究。1994年完成和出版了其第一本专著《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应用》（1997年重版），这是我国

在非均衡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第一本著作。1997年该著作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2000年起，袁志刚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问题上面，陆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养老保险体系和宏观经济增长效率方面的文章，如《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及发表于《世界经济》的《基于经济动态效率考虑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研究》等，论文被广泛引用，在该研究领域产生一定影响。此外，还对中国就业状况和就业政策进行实证研究。近年来，袁志刚还着力于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如中国居民消费、金融改革和房地产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分别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刊物发表了论文《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1999年）、《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2002年）、《房地产市场理性泡沫分析》（2003年）、《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2004年）、《融资合同、信号机制与中国金融结构改革》（2005年）等，在该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论文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等奖项。

曹锦清



曹锦清，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博导。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主要著作：《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国单位现象研究》、《平等论》、《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2000年出版至今已印刷13次，英译本2004年在英国发行。

贺雪峰



贺雪峰，湖北荆门人，1968年生，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在全国20多个省区农村调查，在湖北荆门和洪湖6村从事乡村建设实验。著有《新乡土中国》、《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

题》、《村治的逻辑》等多种著作，发表百余篇论文。邮件地址：
hexuefeng68@163.net。

周晓虹



周晓虹，男，1957年生于杭州。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

自1977年起先后考入南京医学院医学系、南开大学社会系和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并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9年4月至2000年5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7年10月至2008年2月日本名古屋大学社会学系访问教授。

先后出版《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现代社会心理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著译作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及《读书》等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余篇。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宝钢教师奖特等奖；2001年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2004年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9年当选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胡必亮



胡必亮，1961年9月出生，湖北汉川人，研究员。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1980年9月至1984年7月在中南财经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经济学学士；1989年5月至1991年5月在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及亚洲理工学院学习，获理学硕

士。1984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工作，历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现从事农业与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主要学术专长是农业与农村发展理论与政策、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村庄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独著）、《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独著）、《中国的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两人合著、第一作者）作为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的组成部分，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二等奖）；《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论文，《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获1994年度第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乡镇发展研究》（《管理世界》，1990年第4期）获1988年度国务院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发展理论与中国》（独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获200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王绍光



王绍光，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他于一九八二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一九八四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一九九零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在一九七二年至七七年任教武汉市堤角中学，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已出版10本专著，包括《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左脑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超凡领袖的挫败：武汉的文革》（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民主四讲》（三联出版社，2008），他还与胡鞍钢等人合著了多本著作，即《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致良出版社，1995），《江泽民面临的挑战》（明镜出版社，1997），*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M.E.Sharpe, 1999)，《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计划出版社，1999），《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The Chinese Economy in Crisis: State Capacity and Tax Reform* (M.E.Sharpe, 2001)，《政治学的本土化》（台湾：桂冠出版社，2002），《第二层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 (RoutledgeCurzon, 2004)，《和谐社会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China, India and Beyond: Drivers and Limitations of*

Development (Gloucestershir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8). 此外, 他还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

萧功秦



萧功秦, 湖南衡阳人, 1946 年生, 1981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 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兼职教授。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 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 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 《大公报》特邀评论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 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

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 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1986), 《萧功秦集》(1995),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1999), 《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2001), 《知识分子与观念人》(2002), 《中国的大转型: 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2008), 《历史的眼睛》(2010) 等专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 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研究领域包括: 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通史,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等等。近年来从事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以及当代变革史研究。

1998 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1999 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访问学者。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2 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2004 年 4 月与 2006 年 11 月为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者。

时殷弘



时殷弘, 1951 年生。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战略理论、当今国际政治、中美两国对外政策和战略、东亚安全等方面的研究。

曾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1993-1998)、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995-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1998)、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1998-2001)。1996 至 2002 年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会长。1988年6月在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查帕尔希尔分校、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从事累计两年半的独立研究，并曾作为访问教授多次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和在丹佛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讲授研究生课程。

历年来已发表的著作成果为：个人学术专著12部，包括《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对外战略思考》、《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末）》、《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20世纪国际关系》等；编著《战略二十讲》；译著11部，包括《马基雅维里主义》、《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缔造战略》、《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武力与治国方略》等；学术论文、国际政治评论和台湾问题评论450余篇。已发表的著作中许多有较广泛的海内外学术影响或政治/社会影响。

1992年10月起领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获江苏省首届高等院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历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级单位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两次）、中国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两次）、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论文奖等奖励。

林尚立



林尚立，男，1963年生，福州人。现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并留校任教至今。曾在香港、日本、美国做访问研究。曾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委副院长。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和中国政治研究。主要著作有《选举政治》、《政治的逻辑》、《国内政府间关系》、《政党政治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社区组织与居委会建设》、《社区党建与群众工作》、《党内民主》、《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等。

1998年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2000年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2002年当选为全国政治学常务理事，上海政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政治学专家组成员。现为上海政协委员、上海青年常委，上海市理论创新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陈明明



陈明明，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曾教授发展政治学、西方政治学、中国社会与政治研究等课程。主要研究成果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合著）、《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主编）、《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希望》等。

李维森



韦森，原名李维森，1953年10月生，汉族，籍贯山东，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1982年获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从悉尼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2001年回国正式执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6年曾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客座研究员。

自八十年代初以来，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开放时代》，香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纽约《知识份子》等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并经常在《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学消息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经常撰写专栏文章和学术随笔。

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探寻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基础、文化环境与制度条件》（格致出版社2009年出版）。个人随笔集有《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天

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经济学如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出版)、《思辨的经济学》(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6 年出版)，以及《市场、法制与民主》(北京世纪文景 2008 即出)。与汪丁丁和姚洋一起著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2005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译校著作有：米勒的《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马克斯·韦伯的《经济通史》(上海三联，2006)等。自 1987 年以来，曾获教育部、国家体改委、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山东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论文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三项，优秀论文奖一项。

徐勇



徐勇，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

长期从事政治学与农村问题研究。代表性学术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国家建构、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等。2006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36 次集体学习时就“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作了专题讲解。

吴炫



吴炫，男，1960 年 2 月 3 日生于江苏南京。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西湖学者”、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原创》主编。中南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

主要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在哲学、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学等领域，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否定学”理论体系。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能打通

文、史、哲的原创性理论，致力于提出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并改造中西方现有的观念，引起学术界较大反响和关注。所提出的“本体性否定”理论，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 330 余篇，已有研究“否定主义理论”的专著出版。理论上已建立起“穿越”、“独象”、“对等思维”、“不同而并立”、“不美（正常）”、“放松”、“文学性程度”等独特的概念和范畴，并以此介入中国文化、文论和文学批评实践。

已出版《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1），《否定主义美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修订版）、《否定本体论》（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学林出版社 2001 年版）、《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学林出版社 2004 年版）、《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穿越群体》（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否定与徘徊》（1990 年版）、《文学评论十面观》（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批评的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等著作 10 部以上，主编《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2007 年版）丛书、《中国十大社会热点批判》（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等权威和核心刊物发表文、史、哲各类论文 290 余篇。

张乐天



张乐天，1949 年生，汉族，1989 年下乡，1978 年复旦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1985 年留复旦。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学及研究兴趣：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人民公社。

代表作品：

张乐天, 2008: Surviving the crisis: Adaptive wisdom, coping mechanisms and local responses to avian influenza threats in Haining, China,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 Volume 15 Number 1 April 2008,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ISSN 1364-8470)

张乐天, 2001, 《国家话语的接受与消解》, (社会学研究, 2001 年第六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02 年第二期: 论著精华)

张乐天, 2005, 《道德、仪式与农民的行为••对 50 年代初期浙北一个村落的文化解读》, (载于周晓虹、谢曙光主编, 《中国研究 (2005 年春季卷总第一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10 月第一版。)

张乐天, 2005,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2005 年 12 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目前承担课题: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与重建”(教育部 985 文科基地重大项目), 上海文化基金资助项目《联民村纪事••浙北村落的 50 年 (八卷本)》, 与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院合作项目《联民村 - 张乐天数字田野》, 与海宁档案馆合作项目《乡村六十年••海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录 (上下二卷)》。

于建嵘



于建嵘, 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著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安源实录》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 湖南衡阳考察》等。

温铁军



温铁军, 男, 祖籍河北昌黎, 1951 年 5 月出生于北京。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

1979-83 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获法学士学位。1995-2000 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学博士。

执教之前曾经有 11 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 20 多年政策研究经历; 2004 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兼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

执行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2005-06年被聘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战略环评专家，农业部、卫生部、水利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评审专家；2007年当选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和农林经济管理分委员会主席；2008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为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

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9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部级，第一获奖人），2000年获长江读书奖（优秀论文奖），2003年获“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央电视台），2005年获杜润生基金会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环保部等7部委），“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谐中国年度人物奖”；2009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省部级，第一获奖人）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方面——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国内方面——国情与增长、农村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农村财政金融体制与税费改革等。

任远



任远，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担任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2006年获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十大青年人口学家”称号。

任远是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中国人口学学会（CPA）等学术团体会员。

主要的研究方向为中国人口和社会发展。近年来在人口问题和社会政策、城市化与移民、老龄化研究、人口·就业与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研究、城市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几个密切关联的研究领域深入开展研究。近5年来负责和参与的省部级研究课题、政府决策咨询课题和国际合作课题30余项，完成专著和编著5部，在国际刊物和国际学术著作中发表论文2篇，参与著作编写及在国内权威和核心刊物中发表论文60余篇，获得包括国家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学术奖励。（联系方法：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200433，办公室电话021-65643133）

4. 媒体相关报道

解放日报、新民网

复旦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本报讯（记者 彭德倩）昨天，复旦大学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心将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院系为平台，以“国际化”、“跨学科”为特色，以“重新发现中国”和“推进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研究”为学术理念，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国际平台和国际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合作平台。

来源：<http://sh.xinmin.cn/minsheng/2009/12/21/3116960.html>

中国新闻网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

中新网上海 12 月 20 日电 (邹瑞玥)二十日，“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兼任中心主任。

据介绍，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以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院系为平台，以“重新发现中国”和“推进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研究”为学术理念建立的研究中心，目前已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国外著名中国研究学术机构建立合作。

在谈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立的背景时，邓正来说，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发展实践，摆脱了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主流的发展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些都不能依靠引进、复制西方既有理论模式予以解释，必须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分析框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

在当天的成立仪式上，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兼高等研究院院长戈文丹·帕拉伊尔(Govindan Parayil)、新西兰国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系主任胡志德(Theodore D. Huters)、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斯塔夫·杰拉茨(Gustaaf Geeraerts)等 5 位海外著名学者从中心主任、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手中接过聘书，成为了首批“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该中心还聘请了汪晖、赵汀阳、孙立平、王铭铭、温铁军、时殷弘、萧功秦、曹锦清、林尚立等 20 余位著名中国研究学者为首批特聘研究员。

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cn/edu/news/2009/12-20/2027981.shtml>

新华网

复旦大学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新华网上海 1 2 月 2 0 日电 (记者张建松)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2 0 日成立，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兼任该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将以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相关院系为平台，以“国际化”“跨学科”为特色，以“重新发现中国”和“推进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研究”为学术理念，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建成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以及国际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沟通、协调与合作平台。

“当前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其实是一个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中国、主动介入关于全球化性质和方向的话语权争夺，从

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转到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也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今后所必须承担的使命。”邓正来说。

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兼高等研究院院长戈文丹·帕拉伊尔、新西兰国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明等 5 位海外知名学者，被聘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首批“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汪晖、赵汀阳、孙立平、王铭铭、温铁军、时殷弘、萧功秦、曹锦清、林尚立等 20 余位著名中国研究学者为首批特聘研究员。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2/20/content_12674443.htm

解放日报、新民网

复旦国际论坛热议“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

作者：彭德倩

近日，我国公布碳减排总目标引起世人瞩目。昨天，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论坛上，专家表示，减排承诺，是发展必须承受之“重”。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凭借在技术领域的“起跑优势”，已开始形成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绿色壁垒”。

近日，我国公布碳减排总目标引起世人瞩目。昨天，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论坛上，专家表示，减排承诺，是发展必须承受之“重”。

“以环保、低碳为标志的‘绿色革命’，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选择。”联合国大学副校长戈文丹·帕拉伊尔教授说。不少国家已经迈出“绿色步伐”。欧盟将在 2013 年之前投资 1050 亿欧元支持“绿色经济”；美国政府提出，在未来两年将有 1000 亿美元，约合美国 GDP 的 0.7% 用于绿色经济恢复计划。

当前，发达国家开发绿色技术已形成潮流，并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改良铬盐生产工艺是成功案例之一……过去需要 1200 摄氏度的高温焙烧，铬转化率仅 75%，且环境污染严重；新开发的绿色技术，焙烧温度只需 300 摄氏度，能耗少，铬转化率为 100%，基本实现无污染。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凭借在技术领域的“起跑优势”，已开始形成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绿色壁垒”。如欧盟颁布的双绿指令《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要求电气设备生产厂对进入欧盟市场的产物负责回收、处理。《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要求进入欧盟市场的产物不得含有铅、汞等六种有害物质。这两项指令几乎涵盖了我国出口的主要机电产品，涉及 10 大类 20 万种，出口金额 300 多亿美元，将使产品成本提高 10% 以上。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坦言，这固然在一定时间内影响了企业发展，但应该看到技术发展“环境友好”的大方向，只有不畏暂时困境，坚持技术创新，才能迎头赶上，在国际贸易、交流中更加从容。

专家强调，经济发展快不等于好。大力推动节能，可能“拉下”GDP，但应以此为契机，通过改善能源结构来改善经济结构，使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这也是大国应承担的责任。

目前，我国在资源能源利用方面尚有较大改进空间。国家正采取多项措施，克服困难，保障减排目标如期实现。

来源：<http://sh.xinmin.cn/minsheng/2009/12/20/3114674.html>

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

回应哥本哈根大会 复旦研讨新“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论坛在复旦召开

作者：陶韡砾

新闻中心讯 2009年12月19日上午，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论坛在复旦隆重开幕。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玉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联合国大学副校长戈文丹·帕拉伊尔以及日本神户大学副校长中村千春等中外贵宾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并致辞。

王玉庆理事长首先代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祝贺。他表示，本次国际学术论坛召开，正值全球关注人类未来能否实现低碳发展，有效遏制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时刻，是中国学术界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未来命运问题的一次深入反思和及时回应。

据介绍，本次国际学术论坛是复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未来世界论坛”系列的一部分，而创立“未来世界论坛”的目的就在于将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作为灵感之源，从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未来发展路径、秩序重构和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奠定基础。复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告诉记者：“此次论坛希望引导大家先从环境问题和能源技术切入，针对以牺牲社会正义、代际公平、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等为代价而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西方工业化文明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围绕‘绿色革命’所可能引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与世界秩序的重构展开深入讨论。”

开幕式后，王玉庆理事长与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帕拉伊尔教授分别作了题为“绿色革命与技术创新”、“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角理解绿色革命及其影响”的主题演讲。帕拉伊尔教授认为，以环保、低碳为标志的新绿色革命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绿色发展模式也是进一步解决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各种“顽疾”和“综合症”的唯一“良方”。

据悉，本次研讨会共吸引来自海内外的80多位知名专家济济一堂，共同就“绿色革命与可持续发展”、“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绿色发展及中国的战略”、“全球气候变化与国际对话”以及“绿色发展新范式与生态文明”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共同为人类社会未来绿色发展模式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结果将成为专家和学者讨论的焦点之一。

来源：<http://www.fudan.edu.cn/fudannews/2009/1221/23219.html>

东方早报

中国否认与美私搞气候协议

东方早报记者 周晶璐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虽草草收场，但余波未了。

有媒体报道，哥本哈根协议案文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与美国私下达成提交给大会的，没有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意见，缺少透明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昨天专门反击称，有关评论与事实不符，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的。

“沟通是充分、透明的”

秦刚昨天称会议取得了“重要而积极”的成果，他指出，中方自始至终本着合作、负责任和建设性的精神参与谈判和磋商，与各方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协作。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沟通是充分、透明和顺畅的。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 77 国集团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基础四国”在会议一开始就向会议有关方共同提交了案文。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与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有关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晤，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合理要求予以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表示中国愿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下，继续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中国的立场主张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和赞扬。

改变美国主导局面

而在昨天结束的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论坛上，身为联合国大学副校长的印度学者帕拉伊尔肯定了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跟其他国家都同时意识到在减排过程里面必须要共同承担责任。

旧金山州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郭苏建表示，他认为中国代表团表现得很好，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像中国、印度、巴西等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此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改变了以往美国主导的局面。“你可以看到不发达国家在制定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专家们认为在这次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人们产生分歧的地方实际上并不是在于责任的承担，而是在于具体的实施计划。“在这个问题上，长期计划、长期眼光和政治家们的追逐短期利益之间形成了一个矛盾。这就是为何没能达成实质性协议的原因所在。”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协作。”

——秦刚

来源：东方早报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gebenhagenqihou/zuixin/200912/1221_8755_1481423.shtml

凤凰网

http://i.ifeng.com/news.jsp?aid=2352559&ch=0&mid=ab765e3f-b177-488d-8cba-87f8c16fe5de&_gp=0&rt=1

七. 慧园鉴赏会

1. 复旦高研院举办第二期慧园鉴赏会

2009年12月27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办第二期慧园鉴赏会。鉴赏会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



本期慧园鉴赏会的主题是诗词,邀请到了上海文化圈许多知名的同道学人前来参加。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中文副教授、杨浦区楹联学会会长刘德隆,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语文特级教授、上海市楹联学会副会长杨先国,高研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诗人张硕果、惠林等多位来宾带来了各自的诗词作品与朋友们交流。



高研院博士后李永晶听闻高研院举办如此别开生面的活动,特地从宁波发来了贺诗,并委托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邓琳(嘟儿)同学代为朗读。嘟儿同学极具朗读天赋,落落大方,满含深情,将诗词中蕴含的真挚情愫和绝美意境以独特的气场诠释出来。



整场鉴赏会气氛热闹融洽,刘强博士朗读并解析了《蒹葭》,然后朗读自己写的古体诗,声情并茂;诗人张定浩诵读了诗经里的《风雨》,并认为赏识诗歌不能晚于古诗十九首,堪称独具慧眼。成玮博士详细解读了孟郊的《游子吟》的篇章结构和诗人匠心,认为在中唐诗人里独有峭拔之风格和精神;梁捷博士谈到诗歌与人的内在生命和外在生活的问题,诗人王晓渔简论了诗歌古今之精神演变

与个体自由的关系，并诵读胡适录赠雷震的杨万里《桂园铺》。诗人孙刚博士就古体诗的“韵与意境，古韵与现代韵，抒情与歌吟”之间的关系作了质疑，诗评家黄德海就中国古典诗学（风—雅—颂）的结构，阐释诗学在古代政治生活里的要义，可谓提纲挈领。陈润华博士诵唱了宋词《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由下往上游走的饱满气息，再现了古代词人留下的豪情壮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玉峰教授带来了他亲笔撰写的对联，黄教授将对联赠送给高研院，希望同道们能够以诗词创作为乐，不断有好作品奉献给大家。此外，黄教授还将《历代七绝精华》和《诗书画缘》赠送给了高研院，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感谢了黄玉峰教授的赠联和赠书。



与黄教授同行的太谷学派传人刘德隆先生为大家讲解了吟诗技艺，区分了吟、唱、哼以及念，强调了平仄韵律对诗歌创作的帮助，希望大家关注古典文化生活中这一吟诵传统。



杨先国先生为大家朗读了自己以前和现场创作的诗词，谈论了多年来诗歌创作经验，特别就入声字和音韵对诗词的影响这一问题讲了心得体会，平实而深刻的言说得到了在场听众们的共鸣。



吴冠军博士将他多年来撰写的诗词集带了过来，既有吟咏植物美景的高阳台和青玉案，也有抒怀人生的沁园春和鹧鸪天，还有针对当今学术界和人们思想世界的哲理作品渔家傲和荀学。陈媛博士和陈润华博士交替为吴冠军博士朗读，在古典音乐的映衬下，诗歌所暗含的丰富、多变和细致的情感被完美地表达了出来。

其后，复旦大学的许多年轻学生上台朗读了自己的作品，或直抒胸臆，或娓娓道来，年龄最小的嘟儿同学也朗读了自己的作品，抒发了对梦想和理想的向往与执着，表达了内心最真挚、最纯真的感受，诚如邓正来教授在结尾时强调的：从古至今，从西到东，文化人的思维方式不是刻板的、单调的、无趣的，而是活泼的、朝上的、可爱的、富有鲜活生命力的。



附一本期活动旨趣简介

慧园鉴赏会（二）：诗词
在语言的尽头：诗与思

慧园鉴赏会第二期将以诗词为主题。鉴赏会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部分，高研员研究人员将会朗诵抑或吟唱他

们的诗词创作，并阐释他们作品的创作背景。届时亦将邀请上海滩著名的学者诗人，来朗诵他们的新作或旧日成名作，展现名家风采。参会者亦可以朗诵自己的作品，新诗与古典诗词都可以，然后大家一起评赏，去感受诗词中美丽或苍凉的种种意境。短暂的休息后则进入第二部分，大家进一步讨论诗的哲学、语言学、以及日常生命向度，以及大家各自对诗的理解与阐释。有人追随海德格尔将诗词看作是代替形而上学的激进出路，是人们心灵最后的家园，是否只是面对二十世纪巨大存在性苦难的一个美丽的梦？在现代性的状况下，在商品市场与物欲取代人文精神与心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中，诗词是否会随古典形而上学一起死亡？中华文明从先秦开始，诗就扎根在文明的核心处，从文明起源处的“诗三百”到唐宋盛世蔚为大观的唐诗、宋词，诗是中国知识人承载与构建他们精神世界的一个主要途径。而从美学方面来说，诗词凝练的语言，愉悦的音节、声调与韵律，亦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审美上的一个主要对象。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古典诗词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已经没落；而“新诗”的发展亦进入死胡同，取消格律与声韵之后，任何换行分段的，都可以以“新诗”自居，以至有人宣告“诗人死了”，在这个有流行歌曲的时代，新诗已没有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届时在第二期的慧园鉴赏会中，我们将会一一讨论这些问题。

附二慧园鉴赏会简介：

人生天地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依然环绕并贯穿我们的生活。人之为人，秉承天地之无限厚爱，唯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者，所谓独学无友者，所谓格物致知、观风理俗者，皆是要我们把目光投向无穷的远方，把胸怀装下古往今来；对祖先、我们和子孙，对天空、大地和人世，一样的尊重，一样的保持体贴、热爱。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令人回味无穷的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王家的礼乐教育，印度佛家僧团的讲座修行，希腊雅典学院的演议辩论；去古未远，尚有村社私塾-书院-太学体系及道观、寺庙等研习智慧之所在，如今则是大学体系。

未来的世界将是什么，取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慧园鉴赏会意在以纪录片、电影、音乐、戏剧等为引子，对所有爱智者开放的论辩和批评，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风俗和意义，学会锻造我们的著作、生命和敬畏。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慧园鉴赏会未来每月将进行一次，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八. 院内信息

1. 复旦高研院成员接受消防培训

2009年12月8日上午10点，由校方安排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接受消防培训。

主讲嘉宾陈老师从对近年来发生的火灾实例的分析开始，依次讲解了火灾逃生及自救、火灾隐患的预防、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提醒在校广大教职员注意防火，一旦



面临火灾险情，一定要保持镇静，如果火势很小，要尽快使用消防器材灭火，即拔掉灭火器的保险阀后对准火焰底部迅速灭火；如果火势较大，要尽快选择安全通道，以低姿势前行减少吸入烟雾，减少身体暴露，并用湿毛巾掩护口鼻，有条件的话使用防烟面具迅速转移，确保生命安全。此外，陈老师还讲到家庭防火的基本常识，特别是燃气火灾和电器火灾的预防知识等等。

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孙国东、林曦、沈映涵、陈润华、邓正来以及学术联络中心陈晔、黄倩、张东平参加了此次消防培训，大家十分感谢嘉宾陈老师带来的这场公益讲座，并围绕本院的消防安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方法。